民國叢書

第二編

·78·

歷史·地理類

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何幹之著

中國啟蒙運動史　何幹之著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　何幹之著

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　何幹之著

上海書店

序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是在中國民族解放暫時停頓後才出現的。革命的實踐，引起了革命的論爭，論爭所得的結果，又糾正了民族集團中的偏向，幫助了實踐的開展。

現在試任意執住一些肯和實際問題接近的青年，問他們中國是一個什麼社會，我想除了極少數頭腦已經硬化的不算以外，一定會回答是：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會。

可是這個有助於救亡的觀點，並非一朝一夕得來，乃由許多從艱苦的環境出身的學者，在刻苦的研究，分析，論辯中而得的。因此，要不是淺

學的抗爭，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抗爭，就是那些地位不同的社會層的思想抗爭的標本。

近一百年的中國，思想上也起了幾次暴風雨般的波瀾。十九世紀末葉，康梁維新派和守舊派的對抗，二十世紀初，反滿反帝的民族思想和專制思想的對抗，都表示了進步分子與守舊分子的思想抗爭。也許一百多年前的事太久了，用不着去管它，現在就從世界大戰以後的近事說起吧 大戰始於一九一四年，到現在也不過二十二年，在這二十多年的歷史中，中國思想界已捲了好幾場風波了。一九二三——二四年(民十一、二)，思想界有所謂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一九二七年以後，有所謂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一九三四——三五年又有所謂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中心問題，是科學能不能支配人生觀，即人生觀是自

還有一點，目前研究中國經濟，不應該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上，最要緊的是應注意這五六年來中國社會的劇變，應注意這種劇變在救亡運動中所發生的結果，以建立我們抗敵的物質基礎。因此，我特地加上國防經濟一章，專論這個「今天的課題」。

因爲過去所搜集的材料，散在各處，一時不能彙集起來，所以關於新思潮這一章，有些地方寫得不完備。農村社會性質一章，因爲在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一書所收中國農村諸君的文字中，有很好的分析，我不想重複，所以除了第二節之外，其他各節，都寫得很簡單。

如果這本小小的讀物，對於熱心救亡的青年研究中國問題，有點補益的話，那我就感到無上的快慰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

目次

第一章　思想論爭的社會意義

思想上的爭論，並非天外飛來的高調，乃當時當地處於不同經濟環境和政治地位的人們的吶喊。高高在上的代表着上層的人，爲着保存自己的地位，往往不惜絞盡了腦汁，用盡了唇舌，來說明不平等是社會進化的鐵則。社會既然永遠有貧富不齊的現象，大家也只好安天樂命。「世上沒有富人，那裏有人養活貧人，沒有貧人，又那裏有人爲富人做工！」這是對迷信安天樂命的人的第一號麻醉劑。相反的，被壓在九重地獄裏的人們，也不惜犧牲一切，爲着自己將來而奮鬥，不惜赴湯蹈火，爲着自己的信仰而努力。在西洋史上，十五、六、七世紀的神權與民權的抗爭，宗教與科

學的抗爭，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抗爭，就是那些地位不同的社會層的思想抗爭的標本。

近一百年的中國，思想上也起了幾次暴風雨般的波瀾。十九世紀末葉，康梁維新派和守舊派的對抗，二十世紀初，反滿反帝的民族思想和專制思想的對抗，都表示了進步分子與守舊分子的思想抗爭。也許一百多年前的事太久了，用不着去管它，現在就從世界大戰以後的近事說起吧。大戰始於一九一四年，到現在也不過二十二年，在這二十多年的歷史中，中國思想界已捲了好幾場風波了。一九二三——二四年（民十一、二），思想界有所謂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一九二七年以後，有所謂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一九三四——三五年又有所謂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中心問題，是科學能不能支配人生觀，即人生觀是自

由意志還是被決定的。這樣的論辯，不用說是五四時代資本主義文化運動的繼續。那時打倒孔家店，廢孔孟，剷倫常的反封建思想，支配了每個時代青年的思想和行動，「賽恩斯」（科學）和「德模克拉西」（民主政治），變了時代的兩大標幟，舊的，落伍的，腐敗的思想已漸漸站不住了。但在世界史上，不論是沒落的階層或沒落的思想，決沒有平白地退下歷史舞台的道理，它們定要作最後的掙扎。於是乎玄學鬼偷運了船來的骷髏，企圖在中國思想界扮演借屍還魂的喜劇。張君勱先生突然打起了自由意志的旗幟，正表示這種移花接木的戲法。但可惜當時反玄學的主將丁文江先生所用以衝鋒陷陣的武器，是十八世紀的機械唯物論。這是不堪一擊的沒用的傢伙。正因爲這樣，在論戰中，他們不能夠統一客觀與主觀，必然與偶然，必然與自由等範疇，結果不但不能克敵，只混戰了幾場，就鳴鼓收兵，向

敵人屈服了。不澈底的機械論是不能夠戰勝觀念論的，這任務只有留下給人類思想史的結晶——唯物辯證法來完成。到現在，凡受過新哲學洗禮的人，再不會懷着自由意志的懸念。機械唯物論不能夠解決複雜的人生問題，這裏又多一種異思實據的史料了。

社會史，社會性質，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可說是關於一個問題的多方面的探討。為着澈底認清目下的中國社會，決定我們對未來社會的追求，迫着我們不得不生出清算過去社會的要求。中國社會性質，社會史的論戰，正是這種認識過去，現在，與追求未來的準備工夫。這一場論爭所關涉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由目前的中國起，說到帝國主義侵入前的中國，再說到中國封建制的歷史，又由封建制說到奴隸制，再說到亞細亞生產方法。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決定未來方向而生出澈底清算過去和現在

的要求。農村社會性質論戰的目的，更來得鮮明。誰敢否認中國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誰敢否認中國農民解放運動在整個民族解放運動中所佔的重要地位？正因爲這樣，所以對農民運動的性質和任務的估計，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說，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是總的論爭的核心。

一點也不錯，社會史論戰，目前只下了序幕，應開墾而未開墾，應解決而未解決的工作還有很多。例如帝國主義所遇見的是不是封建社會？中國有沒有這樣的時代？這問題在方法論上早已有了答案，並且零碎的史料已證明了方法論的正確性。但中國封建制始於什麼時代，經過什麼時代，那就不是容易解答的事了。中國有沒有奴隸制？這問題經過郭沫若先生的劃時代的研究，已得了初步的解答，但奴隸制始於什麼時代，沒落於什麼時代，又表示着議論紛紜，使人不知何所適從。殷朝是什麼社會？西周是

封建制還是奴隸制？那是爭論的中心。關於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問題最爲混亂。以那時代爲帝國主義所遇見的時代，這在淸算馬扎爾的觀點時已告了結束。但在歷史理論的公式裏，排在奴隸社會之前的亞細亞生產方法是不是一個經濟結構？這點在過去以至現在，不但在史料的發掘和論證上未會有人着手，在方法論上也各執一說，弄得非常混亂。中國社會史問題有許多艱鉅的工作，留下給我們來擔負的。

收獲最大且漸漸廣播於一般人的思惟中的，是社會性質的論戰。在一九二七年後政治退潮期所掀起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論爭，經過「新思潮派」，「動力派」以至其他個別研究，或集體討論；又經過一九三四年以後中國農村派和中國經濟派的論辯，尤其這幾年來中國經濟情報社及其他經濟學者的努力，這問題已經下了最後的奠基石。正如沈志遠先生說：「現在

第二章　中國是一個什麽社會

一　從工業來看中國社會

一部二十四史，從那裏說起呢？

大凡讀過中國史的人，大概不會不承認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狀態吧！如果由周秦一直往下數到明清，我們所看見的不過是朝代的一起一伏，國家的或興或亡，有的是燦爛，有的是偉大，有的是悲慘，有的是壯烈。總之，朝代的起伏和國家的興亡，引起了讀歷史的人發生了無限的感慨。但社會的經濟構造，始終未曾受過政治風雲的來復所影響，人們所見所聞

的只是劉滅秦，或清滅明等等上層變動，而封建社會老是絲毫不被侵犯的屹立着。

社會停滯的根源，乃是農村公社遺留於封建時代，專制主義阻止着手工業的自由發展。不過中國歷史雖然像龜步一般的爬行了二千多年，生產力並非始終停留在同一的水準上，決不是的，龜步的歷史也種下了未來社會的種子。可是在中國歷史剛踏上新舊轉變的緊急關頭，外來的力量已衝破了閉着門不問外事的天朝了。中國一連遭假仁假義的傳教士的作威作福，五光十色的舶來品的橫衝直撞，和所向無敵的砲艦的東擊西射，已弄成半死的狀態，進步的封建官僚，也思量提倡洋務，思量創辦軍事工業。但不幸得很，中國近代工業並非自發的，乃由外來的壓力所迫成。所以經過多次侵略戰爭，與敵人訂立各種賣身契約以後，中國資本主義雖已發了

嫩芽，但列强已憑着它們的雄厚資本，和政治軍事力量，鞏固了支配中國經濟命脈的根基；所有工業，金融，交通，外資都佔了上風，佔了左右全局的地位，中國已降爲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了。

中國工業僥倖地得了一個滋長的時機，正是大戰前後的十年間（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三年）。那時歐洲列强不論是協約國或是同盟國，都爲着上前線進攻或在後方防守，退出了中國市場。中國民族工業好像放下了一塊千担重的石頭，鬆了一口氣，才交了紅運，望着自由的蒼穹挺聳，而發芽，而生長，而繁茂。先讓我舉出幾個簡明的數字來說明一下。中國近代工廠，在一九一三年只有五五九所，到一九二三年曾增至一四〇〇所，十年間竟增加了百分之二五〇。紡錠，在一九〇〇年只有五萬枚，在一九一三年有一百萬枚，到一九二四年已達到三百三十萬枚，計增加了百分之三

三〇。機器進口額的增加，也可以反映出近代工業發展的大概來：

一九一三—一六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五・五（單位百萬美元）	六・七	一〇・二	二一・五	一八・五	四四・七	四二・八	一八・九

這些數字，只可以表示一個傾向，因爲在總數中連外國工廠的數字也包括在內。以紡錠而論，如果不用於本國工場而用於外國工場，其意義是完全不同，因爲外國人在中國創辦工廠，是打擊中國工業化的最可怕的武器。機器進口，是用於中國工場，抑或用於外國工場，是用作生產工具抑或用作學校的實習儀器，其性質也全不相同。爲了具體地了解中國工業化的程度和速度，最要緊的還是把中外資本分割出來，先作一個對比，才可以表示出中國社會的本來面目。

先從重工業說起吧。由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年，中國煤產總額中，外

國資本所佔的比重，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的，即由百分之四七・六增至百分之五六・三（中國經濟情報社）；一九二九年更進而佔百分之七二（馬扎爾）。又據日人武藤丸楠的估計，在一九二六年，外資直接間接所支配的產額，計佔百分之六八，單撫順一地，已佔百分之四十。鐵礦產額，一說日資佔百分之八十（中國經濟情報社），一說佔百分之七九（武藤），又一說佔百分之九十至九五（馬扎爾）。

工業中首屈一指的民族工業是紡織業，世界大戰後蓬蓬勃勃發芽滋長的，也是紡織業。在這一生產領域中，民族的成分有多少，非民族的成分又有多少呢？關於這點，也有許多近似的估計。一說棉紗生產總額，中國資本佔百分之六三，日英資本佔百分三六・二九（武藤）。一說華資約佔百分之六十，外資約佔百分之四十（一九二七年的估計，馬扎爾）。其他繅絲

業，麵粉業，火柴業，捲烟業以至其他輕工業，我用不着再舉例子，只引馬扎爾一句話就夠了：「——差不多在所有工業部門內，外國的企業是最大的，設備最好的，資本最充足的」。我也用不着再舉一九二八至三一年的數字，更不用舉一九三二年以後的數字。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的期間，因爲中國工業的園地裏，搬出了許多沉重的石塊，所以工業的種子，能夠開一朶美麗的花來。接着由一九二四年至二八年，這些石頭雖然原樣搬回來，但石頭終於是石頭，所以工業的萌芽還不斷透過石頭與石頭間的空隙，向着陽光挺直（雖然也經過許多曲折和阻礙）。可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後，即由戰後資本主義第二期轉入第三期的時候，形勢就完全不同了。在那時，正如拉賓斯基所描寫的一樣：「各國爲了外國市場的爭奪戰，已佔據着各個利害的中心」。他們既以中國這樣的理想市場爲他們的

生命線，那麼自然而然地不僅搬回已往的石頭，再加上新的重壓，甚至把石頭混和了士敏土，使石頭間的空隙閉封着，變了透不出氣的石地，於是中國民族工業的生機就給這鋼鐵般的地板窒死了。

我在這裏舉出民族的與非民族的比重來說，是有什麼用意呢？也許中外一視同仁論者以爲何必「多此一舉」，因爲他們相信民族的和非民族的成分都同屬於資本的範疇，而不分彼此的。他們常常反問：卽使外資打倒華資，不是資本主義在中國一樣在發展着嗎？我們能不能這樣寬容大量，不分中外，一體同仁呢？那是不能夠的。在殖民地，外國資本和民族資本的發展，代表着不同的社會意義。爲什麼？第一，外資不但不會受封建殘餘的束縛，反而要利用它來壓抑中國經濟；第二，外資把殖民地當做食糧和原料的來源，所以單發展農業或礦業，以至若干輕工業；第三，外資所

得的超額利潤，並不用於開發殖民地。因此，帝國主義總是維持在殖民地的勢力，以保證他們的統治。中國就是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

二　從農業來看中國經濟

「二千年來中國農家始終以古老的方法和農具耕作着。」（美國商務省：中國提要）

「物品地租在亞洲同時又是國稅的主要部分，但是這種地租形態……在那裏是以隨着自然關係的循環而不斷循環的生產關係爲基礎的。」（資本論第一卷）

這兩段話有互相補充互相啓發的地方。雖然一是出自美國政府機關的報告，一是出自科學的社會主義創造者卡爾的文獻，但是他們的見解，可說是完全一致的。在二千年來，農家都以同一的方法和農具，從事生產；

同時，以自然經濟爲基礎的物品地租，始終不衰；這不是證明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業關係是亘古不變嗎？這話與卡爾在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中以木乃伊來比喻中國，如同一轍。封在棺裏的木乃伊，是萬世依舊的，必須把金字塔打開，屍骸然後才開始腐爛。

目前的問題並非是爛與不爛，那已經是不成問題了。誰敢說一百多年來受外界空氣所激動的中國農村社會，依然未改常態呢？除非是瞎子，任何人都不會有這樣頑固的思想。問題是在於腐爛的程度如何，是腐爛了已化成別的物體，或是正在腐爛着至今還保存本來的模型？這就是半封建說和資本主義說的分水嶺。但是非曲直，是歸於那方面呢，我想事實是最好的雄辯者。

有人問：帝國主義侵入中國農村是爲了什麼目的？那不消說是尋找商

品的推銷場和原料食糧的採集地。他們有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力量，可以通過這力量，用不等價的交換方式來剝削中國農村。因爲如此，就打破了農村的自然經濟，使農產通過了市場關係而受列强資本的支配。當然，商品經濟發展到極點，必然轉化爲資本主義經濟。目前中國農村事實上已有了這樣的嫩芽。然而不幸得很，一來，因爲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城市新興工業受外資的摧殘而失了獨立的根基，因此農業資本主義化也缺了它的先決條件；二來，帝國主義爲要在中國攫取超額利潤，不惜用最野蠻的方法來抑低農產的價格，或直接下鄉收買農產，地主富農目擊經營農業沒有出息，而不願意投資；三來，他們有意無意地扶殖一切前資本主義關係，使它們在農村直接毀滅農業生產；四來，中國田地（尤其是中部和南方各省）大多是出租，且地租很大，往往佔收成的一半乃至四分之三，以

致佃農生活極端困苦，無力改善自己經濟。這種情形，都是阻止着農家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所以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中國，農業確是朝着商品化的大道大步前進，可是並不能夠轉化爲資本主義。

在這外感內傷的病態下，就來了目下的農村問題。農村問題的本質是在什麽地方呢？那就是土地問題。

據一九二七年的調查，中國農業人口中沒有土地的佔百分之五五（佃農佔百分之四十，雇農百分之〇・九，遊民軍隊土匪百分之〇・六），有土地的只有百分之四五。在這些有土地的人民中，佔人口比率百分之三十的大小地主和富農，所佔的土地有百分之七九，反而佔人口百分之六八的中農和貧農，只有百分之十九。也許十年前的調查太舊了，請瞧一九三四年的估計（陶直夫）吧！那估計說明：地主富農佔人口百分之十，但他們

所有土地佔百分之六八；佔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農，貧農，和僱農，所有土地只有百分之三二。第一個估計指出，至少有十分之八以上的土地，屬於十分之三的榨取階層；而十分之七的貧農，只有十分之二的土地。第二個統計指出，十分之一屬於搾取階層的人，佔有土地十分之七，而十分之九的貧農，只有十分之三的土地。這分配是何等的不平均呢！然而不平等的分配，不只在數量上，而且是在質量上。（水田比旱田要肥沃些，但是水田大半是在地主富農手中。比如廣東番禺縣地主富農的田畝中，水田佔十分之六以上，而貧農只有十分之三。）最値得注意的是，土地一天天集中起來。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自耕農在民國元年曾佔百分之四九，民國二二年只佔百分之四五。佃農半佃農，在民國元年，佔百分之五一，到民國二二年反佔百分之五五。這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土地既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那麼請問這少數人是怎樣在利用他們的神聖的私有權呢？因爲中國農業不能順暢地向着近代化的路徑自由發展，所以他們不願留下土地自行經營大農場，而大多數是把田地分割開來，給佃農耕種。富農願意且能夠僱用工人大規模耕種的，也不很多；他們大部分是把一部分土地出租於貧農。剩下的是佔最大多數的身邊蕭條的貧農，他們在農村不容易找到工作的機會，城市工廠的大門又關着，不准他們自由進去；爲了不至餓死，他們不得不咬住牙關，向地主富農租幾畝田，忍受着苛刻的榨取。貧農在苛刻的條件下，既沒有溫飽的福份，自然也沒有力量改進農業。在半封建地主和半封建佃農對立下的土地關係，怎樣阻障着農業生產力的自由發展，還要等待說明嗎？

農業的半封建性，不祇表現於土地分配，土地使用的關係上；在佃租

關係上，在僱傭勞動關係上，在農業經營關係上，也都可以明白看出來。

佃租關係怎樣能夠顯示出農業的生產關係呢？在地租的交付和收受之中，可以表示出土地所有者和農業生產者是怎樣的關係，卽是農民所納的地租是資本主義地租還是封建地租？人與人的關係是地主對農業資本家，還是地主對農民？在目前中國流行着的地租，有（一）力役租，（二）物品租，（三）錢租三種。物品租當中，又分永佃租，分益租，和定額租。力役租是用人力來作地租的抵償，這是封建社會最原始的形式。河南的送工和江蘇的脚寨，就是力役租之一種。永佃制的特點，是把土地所有權分爲兩部分，地主佔有田底，佃農佔有田面，佔田底的收地租，佔田面的使用田地。分益制也有兩種形式，一切農本由地主供給，農民只出勞力，收穫所得農民分二成，地主分八成，或農民分三成，地主分七成的，叫做分益

雇役制；農本由地主和農民平均負担，收穫所得也平均分配的普通叫分益制；農本全由佃農負担，地租由主佃雙方議定的叫定額物租。以各種地租的分佈狀態來說，永佃制流行於東南各省；分益雇役制流行於西北各省；分益制和定額物租制，流行於全國各地；錢租只流行於大城市的附近。以各種地租所佔的比重來說，物品地租佔全地租百分之八十（中央農業實驗所估計）；其他兩種只佔百分之二十。

地租數量的大小，也可以反映出地租的性質。資本主義地租是工人剩餘勞動的一部分，資本家和地主的所得是同等的。封建地租包含農民的全部剩餘勞動，農民所得的只是低度的生活資料。據國民政府主計處的統計，佃農所納的地租要佔全收穫的一半。這一半的收穫，是剩餘勞動的一部分，還是全部剩餘勞動，這還不夠明白嗎？

第二，僱傭勞動關係，怎樣能夠顯示出農業生產關係呢？觀察中國農村社會性質，不是有兩種相反的結論嗎？不是有人當它爲資本主義社會，又有人當它爲半封建社會嗎？但中國農村是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呢？僱傭勞動就是一個很好的測量器，因爲農業經濟是否資本主義，可注意農村中的僱傭勞動是否流行。中國農村中僱農人數有多少呢？武漢政府估計僱農佔全國農民的百分之一〇，中山文化敎育館的估計，也很相近（百分之一〇・二九），農業工人只佔農業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國農業中資本主義的力量有多麽大，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資本主義農業的不振，不只表現於僱農的數量上，而且表現於它的性質上。在較落後的地方（廣西），流行着奴隸勞動；在全國各地，流行着僱役勞動。農民要忍受那種半强制的工作，不出乎這幾種原因：（一）他們缺乏土地；（二）他們負債；（三）他們缺乏

耕畜農具。自然，在全國各地相當流行的，也有資本主義的農業工人。

在農村中靠勞力生活的雇農，收入有多少呢？他們之中有年工，季工，月工，日工四種的不同。其中日工工錢最高，每日平均有三角四分，（不供飲食）；最低的是年工，平均只得一角三分（上海工人，每日平均計有七角一分）。可知農業工人，所過的是什麼樣的可怕生活！

除貨幣工錢之外，有用穀物來償付工錢的，這可算是最落後的一種工錢形式。有用土地或耕畜的使用來抵償工錢的，這是雇役勞動的變相。更有用娶妻來作工錢的，這可說是奴隸勞動。

第三，爲什麽農業經營可以顯示出農業生產關係呢？農業經營的研究，是要在農業生產關係的發展中來觀察農業的生產方法。農業經營所應注意的是工錢勞動的使用和經營的集約程度。工錢勞動使用多少呢？經營

的集約程度是怎樣呢？是粗放化還是集約化呢？

在目前中國農村中，純粹的封建關係，即地主立脚於傳統的身分關係，世世代代對農民施以一種超經濟的剝削的，只限於落後的邊陲省境。同時，資本主義的地主經濟（不論地主自己動手經營或租地於農業資本家），在現在也不大流行，不大普遍，即使有人想努力推行，到底也全歸失敗（江蘇南通）。目下最流行的是半封建的農業經營，即是商品經濟已普遍流行，土地已自由買賣，身分的等級制已失了基礎，可是土地仍操縱在地主手裏。那時農業經營具着兩種形式，地主分割一部分土地租與農民，或留下土地自己經營。但農民是以一弱者向地主借田，所以他們和地主仍留存着主奴的關係。地主雖然雇工耕田，但被雇的工人是受土地債務的束縛，勞動多少帶着半强制的性質：這種關係是半封建的收租地主與佃農的

對立。半封建的經營地主和雇役農民的對立，決不是資本主義的經營。

再從農民經濟來說，也是一樣。自給的農民經營，目前雖然不能說沒有，但決不是主要的形態。富農的經營，在若干地區，也只有了萌芽。因此，在農民經濟中最普遍流行的是商品經濟。這種經濟具着兩種形式，在內地，農民還保有相當的獨立地位；在沿海沿江各省，商業高利貸資本，已控制着農業生產，而這商業資本，與都市民族資本和帝國主義，又發生着密切的關係。這種農業經濟既不是自然經濟，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乃是在帝國主義統制下的商品經濟。

三　從金融貨幣來看中國經濟

工業和農業是屬於生產領域，而金融貨幣卻屬於流通領域。在人類社

會的太古時代，工業和農業是不分家的，農民是手工業者，手工業者同時又是農民，各人都流着自己的血汗，來建築自己的生活基礎。那時沒有經常的交換，更沒有所謂作爲交換的媒介物——金錢。接着因爲生產力的進步，人類的慾望和要求的增大，大家不但沒有可能製造一切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並且也沒有這樣的必要，於是交換就由偶然的現象變爲普遍的現象，於是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普遍交換尺度。這尺度就是當時當地效用最大最易保存的東西，如皮貝等等。最後這尺度又演變爲金子、銀子、銅子。

資本主義經濟是由單純商品經濟演變而來的，因爲經濟性質不同，貨幣的性質也不同。在前一種經濟組織中，貨幣只是流通的媒介，反之，貨幣在資本主義社會，是榨取剩餘勞動的工具，貨幣變成了資本。資本不斷在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循環，乃表示着資本關係的不斷再生產。然而資本

家投資於工業，總有碰着週轉不靈的一天，那時他們必定要向專門經營生利事業的銀行借債，生產才不至於中斷。工業家向銀行家舉債，必須附帶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們要把生產得來的利潤，分出一部分，來奉獻於銀行。銀行的功用，在於促進資本的循環，卽促進由貨幣而商品，而新貨幣這個循環。在這時候，銀行主要的業務是經營存放的生利事業，它們對工業只有債權和債務的關係，而不負經營責任。但生產越發展，規模越大，工業家向銀行借債也就越迫切，銀行對於工廠的經營方法，就不能不大加關心。銀行家要求工業資本家對製造商品和購買原料，要聽從他們的指揮，他們要干涉生產事業，於是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就成了一家，變了金融資本。那已是資本主義獨佔時代的產物了。

這是一些基礎理論上的問題，爲什麼要拿到這裏來講呢？這是要表明

金融貨幣是歷史的產物，它有着時間性，也就說金融是隨着歷史的演變而演變的。當然這現象在中國，也是不能夠有什麼變則的。在鴉片戰爭以前，在中國頂刮刮經營商品流通的機關是山西票號。自從帝國主義侵入，商品經濟流行以後，這有濃厚的地方性的票號，就不能適應着新的要求。代山西票號的地位一時執着金融界牛耳的是錢莊。然而錢莊因爲沒有現代金融機關的技術和管理，而且經營並不集中，聯系並不廣大，因此建築煌，資本雄厚，組織嚴密，聯系普遍，而爲列强作開路先鋒的近代銀行，又應運而生，起來代行錢莊的職務了。這此銀行不論是外人直接經營的，或是中國人經營的，都是反映着這一客觀的要求。

總之，中國金融機關是順着票號，錢莊，銀行的演變而滋長起來，站在它背後推動它培養它是帝國主義。但我們應記得，帝國主義决不會隨便

推動什麼，培養什麼的，必須銀行對他們有好處，才肯這樣出力。帝國主義向殖民地進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傾銷商品和收集原料，中國的金融組織就爲他們效勞，一面推銷商品於內地，一面又由內地爲他們吸收原料。在這賣買過程中，進口外商要通過錢莊，收回貨款，出口華商，也要通過錢莊，向外行提款，而中國銀行，却在旁邊供給銀莊以活動費，或在金融市場買入外商的匯票。通過了這過程，外商自然可以逍遙自在地達到他們控制殖民地的目的，而錢莊銀行也可以乞憐於主子的面前，要求分我一杯羹了。帝國主義要來奴化中國，而中國錢莊銀行反而從中做他們的經理人。

中國銀行臃腫病的內在條件是托賴於中國政府公債政策。中國財政經常是歲入不敷歲出的，財政不平衡，軍費和外債本息的日漸增加，是裏面最大的原因，所以等到加稅增捐也不能應付時，就只好發行公債，來臨時

救急了。北京政府由一九一七至二六年，所發行公債總額，超過了六萬萬元，國民政府，由一九二七年至三四年，也發行了十四萬萬元的公債。誰承受那數目這樣浩大的公債呢？一般國民，連日常生活費也成問題，當然不能購買公債。如果政府一定要强制執行，必定鬧出很大的亂子。於是政府的一等策士想出一條捷徑來。這一捷徑是由銀行代理發行或預先抵借。公債的利息最低也有了六厘，債劵只是六七折計算，所以實際的利息，要在三四分以上。銀行有這樣的肥利可圖，只要本息有確實的保障，誰不想發這樣的横財？所以銀行和公債發行起着一辯證的關係，卽是公債發行越濫，越刺激銀行的興起，銀行越多，公債發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於是公債與銀行就成爲一對雙生兒，相依爲命地活着。一九一八至二一年，一九二八至三一年，是北京國民政府發公債最濫的時期，同時也是銀行最有生

氣的年代。與賣買公債具有同一性質，也是非生產的投資的，要推經營地產。據統計，中國新與銀行當中，以商業儲蓄爲業務的佔百分之六四，這一點已夠證明中國銀行的寄生性質了。中國金融資本，原來是買辦高利貸資本的變相，他們爲帝國主義的搾取網作經理人，推動中國向着全殖民地的路子走，企圖分一部分殖民地利潤。他們又和軍事機構結成一條戰線，支持半封建的搾取網，從中來分一份肥利。這種半買辦性半封建性的所謂金融資本，是中國社會最好的寫照。因爲金融資本是有這兩重特殊任務，對於民族工業，自然也起着阻滯的作用。銀行對工業放款，比投資公債和地產，不知相差有多少。據統計，銀行的工業放款，只及機關放欵的四分之一。並且這種放欵，也離開了生產的立場，只是生利的投資，對於工廠經營的盈損，是不聞不問的。放款期限很短，利息又很高（由七八厘至

一分五厘）。所以與其說銀行幫助工業，不如說是打擊它，反來得合理。

現在我們可以收束一下，作一個最後的結論了。有人問中國是什麼社會，我可以絲毫不用遲疑來答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或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會。

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已經明白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中是佔着決定的支配作用。在國際金融資本的控制下，中國工業是沒有合理發展的可能性的。瞧吧，金融資本不是自始至終就出死力阻止中國機械工業的發展嗎？他們開發中國的資源，也不是用來充作大工廠的原料，加强他們向世界市場爭霸的力量嗎？他們的確輸出了一些輕工業資本，但是，這也無非是爲了競爭市場或利用中國過剩的勞動力。總之，在殖民政策下，中國工業休想能夠自由發展，休想能夠建立一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這是半殖民地

社會應有的文章。我不說它是全殖民地而說它是半殖民地，這有什麽根據呢？印度是英國的全殖民地，所以英國資本在這裏壟斷了一切，印度民族資本，只居於從屬的地位。從這點來看中印民族資本，它們只有數量上的不同，而沒有本質上的不同。什麽是本質的不同呢？本質的不同表現於印度在政治上是一個完全隸屬國，沒有自主的政治權力，也沒有自主的經濟政策。中國並非是這樣，中國中央政府的基礎，不論如何脆弱，在形式上，它總是一個半獨立政府，多少有半自主的權力，所以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涉和統制，也有半獨立的可能性。這半獨立的性質，當然要跟着金融資本統治的動搖，和民族危機的加深，而一天比一天縮小，可是在這半獨立的政權未全被消滅之前，還不失其半獨立的性質。在這一認識之下，我說中國經濟是半殖民地性的。

什麼是半封建社會呢？它不是一種自然經濟，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國目前除了若干最落後的地方外，商品經濟已普遍流行於全國，在若干大城市，新興工業也很不少。不過在金融資本的統治下，只發展了商品經濟，只在某生產部門中才有資本主義的企業，民族工業是沒有健全發展的趨勢的。在農村裏，半封建關係依然保存着。所以現階段的農村經濟，是一種過渡形式，融合着封建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應死的不能立刻死去，應長的不能自由生長起來。這過渡形式，我們叫它做半封建經濟。

我還想要申明一點，這兩種性質是互爲因果的，因爲中國處在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中國停留於半封建的階段，同時中國社會的半封建性又促着中國向全殖民地化的徑途邁進。外部事情足以影響內部事情，內部事情同時又影響外部事情。這就是中國社會的二重性質的交互作用。

第三章　蘇聯思想界對於中國問題的觀察

一　兩種根本不同的看法

中國問題已不是中國人的問題了，尤其在閉關自守時代已經過去的今日，這是雨打不破，風吹不滅的眞理。然而外國人對中國民族解放的認識並非完全一致，各國都有許多不同的觀點，而這些不同的觀點，乃由各人對中國經濟結構的認識不同而來的。單就蘇聯而論，他們對中國問題就有兩種根本不同的主張，兩種根本不同的看法。當然，這些不同的政治主張也是由他們對中國社會的了解不同而來的。中國各大城市有資本主義的企

業，在某些地方還有資本主義的農場，有人根據這等事實，就給中國社會下了一個定義：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他們雖然明明看到中國還有封建勢力的存在，但是他們眼中的封建勢力，早巳變爲不成器皿的東西，乃是「殘餘的殘餘」；他們也不敢承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一個獨立的民族，而高高在上的還有紅髮綠眼的洋大人，首鼠兩端的小鬼，但他們對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的認識，也有獨具隻眼的高見，以爲帝國主義束縛中國的只是海關制度，執行反海關的革命，就可以解除中國民族的枷鎖，促進國民經濟的繁榮了。這樣的分析，必然要影響到他們的政治觀點。旣然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而資本主義又不是他們的理想制度，所以他們認定中國革命運動是反資本反工錢勞動的運動，中國反帝的任務，只是要求海關的獨立。

有些人又抱着另一種不同的見解。他們也不否認中國有資本主義的企業，可是中國並非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封建勢力還居着優勢的地位。雖然在農村經濟中，也有近代農場，但農村中的主要生產關係，還是半封建的小農經濟，近代農場，決沒有自由發展的前途。帝國主義壓抑中國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他們可以在中國的通商口岸開設工廠，進行採集原料或製造商品，直接同中國的民族工業競爭，他們也可以一手壟斷中國的一切交通機關，便利商品原料的運輸和推銷，他們更可以扶殖當地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的關係，打擊民族資本的發展。所以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中是最高的司令塔，直接指揮操縱一切，變成了獨一無二的主腦。總之，資本主義是已經出現了，前途却黯淡無光，封建制度也已經在崩潰的過程中，但因爲有帝國主義的有意無意的扶助，它到今日還佔着優勢的作用。所以，中國

現階段的矛盾，是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勢力，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平等，改變農村的半封建生產關係，消滅中世紀式的剝削。總而言之，這派的人認爲，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中國當前的兩大任務。不過，他們認爲，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後，並不是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體系，而是越過資本主義，轉變到更高一級的社會形態。

那兩種不同的政治主張，是兩種不同的經濟分析的結論。前一種主張是蘇聯少數黨的主張，後一種主張是多數黨的主張。這兩派的政見在蘇聯鬧了好幾年，尤其在國民革命時代，爭論得特別起勁，特別嚴重。接着這些不同的見解，又傳播到中國來。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那時正是中國政治運動的暫時潛伏，和民族危機的開始，所以這問題支配着當時的文化界，成爲每個前進的民族戰士的精神糧食，激盪着每個中國民衆的心

坎。因此，我們想要了解這個問題在中國是怎樣提出來，怎樣爭論着，首先應當回顧一下蘇聯的論爭，看一看外國人是怎樣觀察中國問題。

少數黨的路線，以托洛斯基，季諾維夫，拉狄克爲代表。他們否認封建的壓迫在中國有主要的作用，否認農業革命有舉足輕重的社會意義，只承認中國資本主義要求關稅自主是帶上反帝的性質。托洛斯基有一段話，最足以表示這一派的見解，他說道：

「布哈林企圖拿根據封建殘餘在中國經濟中佔有主要作用這個理由，以證實機會主義和妥協主義的路線。這個企圖是根本上沒有根據的。縱使布哈林對於中國經濟的估計，是根據於經濟的分析，而不是根據一些學院式的定義，那橫豎是一樣；封建殘餘不能辯護，很明顯的，是促進了四月事變爆發的政策。中國革命所以有民族市民階層的性質，根本的原因，是在於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已

這話是托洛斯基在其中國革命與約瑟夫提綱一書中說的，原文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五月。這裏雖然以布哈林一個人爲批判的對象，可是布哈林當時是站在多數黨的立場，並且是這派的一員大將，所以骨子裏還是反對多數黨。這番話是說，中國現階段解放運動的動機不是反封建殘餘，而是反工鑛勞動制；這番話是說，由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基礎是海關爲各帝國主義所把持，所以中國革命是一種反海關的革命。

非常明顯的，這番話必定引起反對者的意見。爲什麼？因爲如果中國沒有封建勢力，或者這勢力在中國農村沒有左右大局的地位，那麼農業革命一定沒有基礎。但事實是怎樣呢？是不是中國改造運動沒有反封建的基礎呢？約瑟夫說：

「若是在許多省區內，農民收入百分之七十，要繳納給地主和劣紳，若是在地主(武裝的或沒有武裝的)手裏不但只操有經濟權，而只操有行政權和審判權，若是在許多省區內，現在還保存着中世紀式買賣婦女和小孩的風俗，——若是這樣，那不能不承認現在中國農村中基本的壓迫形式就是封建殘餘。尤其是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的上層建築物，是中國的基本的壓迫形式，所以現在中國發生着偉大的（按自身力量及其發展）農業革命。」（論反對派二八九頁）

所謂農業革命就是市民階層性的民主革命，即在經濟上要求解除一切中世紀式的壓迫，統一全國市場，在政治上建立民治的國家，形成統一的民族。但民主革命在中國不僅要反封建勢力，同時並要反對帝國主義。因爲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所有的經濟財政金融軍事的力量，不僅直接支配着全中國，並保護一切前資本主義關係，使它近代化，又使它頑强化，通過

這種關係，來間接支配中國。所以消滅封建勢力非同時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不可。反帝的任務不僅要達到取消局部的不平等條約，要求海關自主就算了事。

「中國革命的特質之一，就是這革命是市民階層性的民主革命同時又是民族解放，集中他們的攻擊力於各帝國主義支配。這就是它和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分歧點。事實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支配，不單依靠於軍事力量，並依靠於鐵道，工場，礦山，銀行；這些工業的骨幹，是操於帝國主義的。所以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的代理人的運動，是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中國革命問題五頁）

又說：

「……帝國主義及其所有財政和軍事力量之在中國，就是擁護且推動那些封建勢力及其全部軍閥官僚的上層建築物，使牠歐化，又使牠守舊的力量。」（論反對派二九〇頁）

在少數黨中，堅持否認封建勢力的作用的還有拉狄克。他以爲商業資本在中國已有久遠的歷史，蠶食了封建勢力，所以現在中國農村沒有封建勢力的存在，「中國農民運動主要的是反對資本主義而不是反對封建殘餘。」（論反對派二六七頁）

但商業資本是不是新的生產方法的創造主呢？在中國史上雖然商業資本長期存在着，但它是不是封建制度的對立物呢？約瑟夫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定在榨取農民的血汗這一點，商業資本和封建勢力並無二致——不，商業資本簡直是封建集團的一個主要的構成分子。他說：

「拉狄克的錯誤，就是沒有了解這種特殊的形式；沒有了解：中國鄉村中商業資本與封建殘餘統治間的這種結合，同時保留中世紀封建式的剝削農民的方法和壓迫農民的方法。」（論反對派二六八頁）

這裏很明顯的劃分了兩條界線，兩個派別，兩種觀點，少數黨主張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農村沒有封建勢力的地位，所以中國解放運動是反資本的運動，中國革命帶上反帝的性質，是因為各帝國主義操縱中國的海關。總之，他們主張中國革命「要以與十月革命相恍惚的速度而發展着」。相反的，多數黨主張封建殘餘及其武裝是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力量，帝國主義扶殖它們，使它們摩登化同時又更醜惡化，通過這一個力量而實行統治；帝國主義又支配了中國近代工業的骨幹，操縱了財政，金融，交通的特權，變成了唯一的稱霸者，所以要反對封建勢力，非同時在中國與帝國主義抗爭不可，因為不與帝國主義作無情的鬥爭，是不能澈底消滅封建勢力的。中國革命是：「中國市民階層性的民主革命，同時就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

二　中國將來該走那條路

這是兩派不同的政治主張。少數黨主張中國革命運動是反資本的運動，多數黨主張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這裏有一問題，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那一派的政見是正確，那一派的政見是錯誤呢？要作這樣的判斷，我以爲不能以左得可愛或不可愛爲根據。因爲「左」的言辭乃是嘴裏的空談，不是客觀的事實。政治運動是經濟關係的反映，有什麽樣的經濟條件，就出生什麽樣的政治要求。所以我敢提出這樣的先決條件：中國經濟發展水準就是中國政治理論的測量器。記得恩格斯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話：自然的運動是辯證法的試金石。這話有什麽意義呢？這是說，與其說辯證法是眞理它才合乎客觀的運動，倒不如說大自然的客觀法則，才是辯證法

的準繩。拿這話來證驗中國革命理論，我們也應該如此，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水準是中國革命觀的最後試金石。

我們已經知道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傾向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是最主要的構成部分。雖然我們不能說在中國沒有大農場，但只限於一二地方，或限於某種生產部門，此外就全是小農商品經濟。商品生產當然向着資本主義的途徑發展，但是滿途荊棘，無路可走。在城市工業方面，中國沒有機械工業，鐵煤礦業，只為英日供給原料。總之，整個國民經濟的有機體都有帝國主義的烙印與封建勢力的踪跡，所以把軀體弄成千孔百瘡。像這樣「外感內傷綿纏百年」的廢疾，決非用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方法所能奏效，也決非用不對症的藥方所能醫治，非先把社會機構內的兩個毒瘤——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割下來不可，即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肅清封建

勢力。更明確些說，反帝反封建是中國國民經濟的唯一生路。說到這裏，是非曲直，已擺在人們的眼前，用不着爭辯了。日本的藏原唯人說得好：

「約瑟夫井非要批判托洛斯基才能够站在正確的立場，不，相反的，正因爲他立脚於正確的立場然後可以批判托洛斯基。但正確的立場是怎樣得來呢？它不是由批判錯誤的指導方針而直接得來，乃由批判過去一切實際行動而得來的。」（藏原：藝術論四一六至一七頁）

這話是藏原於一九二八年十月和中野重治，鹿地亘爭論藝術理論時講的，這觀點不只暗合於恩格斯，拿來做測驗中國革命觀的方法論，也是非常確當的。

話說到這裏，只剩下一個問題，等待着我們來解答。過去民主主義運動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有法蘭西式的，有普魯士式的，有日本式的，也有

土耳其式的。法國的路是資產階級領導農民工人，以堅强不屈的態度來推翻封建貴族統治的運動。普魯士的路是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同化過程，封建地主蛻變爲資產階級。土耳其式的革命是商業資產階級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各國社會運動，採着不同的形式，乃經濟狀態不齊一的結果。但不論什麼形式，法國式也好，普國式也好，土耳其式也好，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新興資產階級得了政權以後就立刻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建立民治國家。在法，在德，在土；雖然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同，但發展的傾向是相符的。現階段中國民族解放正處在民主主義階段，是不是中國將來要走其中任何一條路呢？

中國不會再走法德土各國的任何一條路。

爲什麼法國的路對中國是沒有意義呢？第一，要市民階層澈底肅清封

建餘孽，必須他們和封建勢力的利害根本不兩立。這條件在中國是不存在的。爲什麼？理由很簡單，就因爲「全部與土地有血統關係的中國市民階層都是地租的獲得者，與對於農民的徭役的和高利貸的剝削有利害關係……所以市民階層領導農民直接反對地主的革命不可能。」（瓦爾加：中國革命的展望，附載在中國經濟大綱，四二三頁。）第二，法國革命發生於資本主義的勃興期，而中國民主革命却出現於資本主義的沒落期。時代不同有什麼關係呢？關係是有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的勃興期，市民階層對革命的態度是非常堅決，他們「是一切反對封建地主的勞動者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四二三頁）。到了沒落期，他們對革命的要求已根本改變了，他們「在任何時期都預防一切取消封建成分的革命企圖」（四二四頁）。

爲什麼普魯士的路在中國是沒有根據呢？第一，要變封建地主爲資產

階級，首先就要有這種轉變的物質基礎，那是大地主經濟——「普魯士農村經濟生活的特點」，但是中國土地的佔有，是非常「分散」的。第二，由封建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必須廣大農民從土地「解放」了出來。在普魯士，這羣農民，有一部分是被新興的資本主義工業吸取了去，另一部分，却成羣結隊流入於美洲。這些條件在中國是沒有的。因爲中國民族資本的力量是非常可憐，因爲列强梗塞着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所以中國的新興工業絕對不能吸收那不能立足於農村的過剩勞動力。同時，移民於南北美，或移民於東北與西北，也是「此路不通」（四二四至二八頁）。

爲什麼土耳其的路對中國是不可能呢？第一，中土兩國的社會結構不同。土耳其革命是民族商業資產階級革命，革命發展下去，必定反對下層的解放，但中國千百萬的下層羣衆已經起來爭取他們的生存權了，所以不

容許有這一革命形式的發生。第二，在國際地位的觀點上，中國與土耳其間也有很大的距離。土耳其不是一個重要市場，所以不引起列强的十分重視。在民族關係上，土耳其是許多民族的國家，很容易受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中國的實際情狀並非這樣。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市場，任何列强都不肯放過它；中華民族是「單純的民族」，帝國主義要支配中國，就不能不直接打擊整個民族，因此，民族解放鬥爭帶着深刻的反帝的性質，搖動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基礎（論反對派二七八至七九頁）。第三，在抗戰的軍力上，中國和土耳其也不相同。土耳其的軍隊，實質上並不弱於歐洲帝國主義的軍隊，所以在歐戰後發動民族獨立的抗戰，其勝利的可能自然很高。帝國主義在一百年來因有不平等條約做護符，可以駐兵於中國的大城市，停航軍艦於碼頭，並航行於內河，握着軍事上的咽喉。

西歐的歷史，近東的歷史，不會在中國重寫一遍。中國改造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它具備兩重的任務，那是過去英法德美俄日土的歷史所沒有的。同時，革命的執行者不是上層，乃是千千萬萬的下層國民，所以中國改造運動，走着另一個方向。讓我再引一段話來申說一下，這話出自約瑟夫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演說辭，題爲中國革命的展望，他說道：

「米夫相信中國將來的新政權是工人領導下革命小資產階級的政權。這話有什麼意義呢？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孟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同是小資產階級政黨，在某程度上又是革命的政黨。這是不是說，中國將來的新政權是孟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政權呢？不是的。爲什麼？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克的政權是帝國主義政權，而中國的新政權，乃反帝的政權。這是根本的不同。……

「……我深信中國將來的政權，從它的性質來說，與俄國一九〇五年的政權，是十分相類的（雖然主要的是反帝的政權），即下層人民的民主主義。這就是非資本主義的，或嚴格說，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權。」（中國革命問題一三一一九頁）

第四章　新思潮派的強點與弱點

一　論爭的歷史價值

蘇聯開始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的爭論是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民族革命戰線內部，在那時已埋伏了非常嚴重的衝突。到後來矛盾掩蓋不住，終於鬧成了革命的大决裂。經過這次的大風暴，中國時局起了一大變化，民族解放運動暫時退了潮。這一劃時代的政治轉變，引起了民族革命戰線內部的嚴格的自我批判。爲什麼政局的變遷使民族解放運動遭受暫時的失敗呢？要回答這問題，就不能不檢閱民族大聯合的基礎與大革命失敗的社會

根據。大聯合自何而來？關於這問題，我曾說過這樣的話：「在帝國主義的壓榨下，中國社會的生產力，永遠沒有合理的發展，使中國陷於慢性恐慌的深淵中。在深淵中呻吟的是極少數買辦地主軍閥以外的全民族，所以中國的被壓迫民衆，無論民族資本家，商人，工人，農民，都要起來打倒橫暴的帝國主義，解除民族的束縛，爭取民族產業的自由發展。」（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就是民族聯合的經濟基礎。可是我們仍千萬別要忘記：民族資本對民族革命是非常動搖的。他們打起了民族改良的口號，希望革命不要超出他們所要求的限度，因此，等到解放運動越出了改良的軌道，同時又是民族敵人威迫利誘他們的時候，於是他們離開了戰友逃跑了。同時，那時候指導革命的最高機關，專事上層勢力的勾搭，不顧下層人民的統一，以督促監視上層，等到上層勢力投降了敵人，出賣了戰友，

也只有眼巴巴看着革命潰滅了。有了這客觀與主觀的條件，使民族解放運動在這時局的變遷中遭受了暫時的失敗。自這次政治大轉變以後，對於民族革命的戰略與戰術問題，我們必須有一番嚴格的檢閱，我們要檢閱民族革命的性質，我們要檢閱民族大聯合的形式，我們要檢閱各階層對革命的任務。但要知道革命的性質，革命聯合的形式和各階層的歷史任務等等，先決的條件必須知道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是一個什麽社會呢？那是一切問題的中心。因此在大革命失敗以後，對社會性質的問題，加以充分的分析研究，作爲決定未來抗爭的戰略戰術的前提，作爲再出發的基礎，那並非是多餘的事。

第二，在分析研究中國社會性質時，各黨各派就展開了各自的政治主張。在民族戰線內，各黨各派對革命所抱的態度，所採的策略，是有各

種各樣的。有人主張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張反帝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張工人階級革命。這種不同的政治觀點，是由社會性質的分析不同而來的。要是承認中國是一個金甌無缺的封建社會，那麽資產階級自然是時代的驕子，工人農民休想插嘴！要是承認中國是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那麽革命形式必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革命的執行者必然也是下層勢力。要是以中國爲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當然是唯一的革命主力。不同的政治觀，是由不同的社會觀而來的。對於這一點，申報記者在那時發表了很精彩的意見。他深信這「根本問題未得解答之先」，其他幣制問題，金銀問題，關稅及各種稅收問題，好像「不附幹之枝葉，漫無歸宿，而其討論之結論，亦將歸於蹈空，無補於中國經濟之前途」（轉引用王禮錫：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這話的確沒有半點誇張，不先認識了

社會的性質，大談政治革命，經濟改造，正如「不附幹」的「枝葉」，無主的孤魂，是無所寄托的。各黨各派要決定本黨本派的政綱，打擊敵黨敵派的政綱，就不得不發掘中國社會結構的內層，確認中國社會的性質，以決定中國社會改造的動力和方向。在抗爭再出發之前，迫着各階層各黨派的學者，爲着確定或辯護他們未來的政治生活，非先解答這根本問題不可。於是在公開的半公開的或不公開的刊物上，各人都展開了自己的認識，以刀槍相見。

爲了檢閱革命失敗的原因，規定革命的政綱，不得不分析研究中國社會的性質，各黨各派爲了宣傳自己的政綱，打擊敵黨敵派的政綱，也不得不爭論辯護中國社會的性質。

在中國思想界最先規定中國社會爲半殖民地性與半封建性的，是「新

思潮派」的王學文先生與潘東周先生。我稱呼他們爲新思潮派，因爲他們都是新思潮社的分子，他們分析中國經濟的主要文獻，都登在新思潮雜誌上。一九三〇年五月，新思潮出了一個中國經濟研究專號。在這專號上最令人注意的，是潘東周先生的中國經濟的性質和王學文的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將來。同年六月，光華書局刊行了社會科學講座第一卷，又載有潘東周的中國國民經濟的改造問題。這幾篇文章，是新思潮派的代表文獻，也是嚴靈峯任曙後來所批判的對象。嚴任的觀點，接續在第五章加以全面的檢討。在這裏我先來考察一下王潘怎樣把意見發表出來？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是怎樣？已解答了什麼？留下了什麼？什麼是强點？什麼是弱點？

這是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第一聲，是非常可寶貴的。

二　半封建觀

中國社會的定義，是各黨各派所爭論的焦點，一切都由這裏發生的。既下了定義，各人自然在定義的範圍內搜集具體的材料，以說明定案。因此我的關於論戰的總決算，也想從定義開始。先發難的新思潮派，給中國社會所下的定義是怎樣呢？王學文先生說：

「中國經濟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中國經濟論四七頁）

「……中國經濟就其主要的勢力及其發展方向來說，乃是個保有強大封建關係而走向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的途中。這是說中國一方面是在國際帝國主義的統治下，使全國成爲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方向的發展，但另一

方面仍然保持強有力的封建關係。」（社會科學講座二二二頁）

雖然這不是極嚴緊的定義，但中國社會性質的特點，在此可說已具有一個雛型。所謂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社會的定義，在此已有了一個雛型。說到定義，我記得伊里奇曾說過一番非常扼要的話：

「太簡單的定義，雖然能够總括主要點而很方便，要是必須特別指出那主要點的精微處，那這種定義，就太不充分了。我們不能忘記一切普通的定義只有一定的和相對的價值；它們不論如何也不能統括某種主要點在其整個發展過程中所有各方面的聯系……。」（帝國主義論）

爲要特別指出各主要點的精微處，爲要總括各主要點在發展過程中所有各方面的聯系，對於中國社會的定義，必須解釋一下。

先從半封建性問題說起。要知道這問題，先決的條件必要知道帝國主

義的殖民政策。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獨佔階段，在這個時代，獨佔是代替了（並非排除）自由競爭。稍爲讀過西洋史讀本的人，都曉得資產階級在歐美各國，改變了封建的生產關係，建立了民治的國家。這歷史的事實我們不難明白。但是，資本主義到了中國，却演着反動的角色，維持着中國前資本主義關係。從辯證法的立場，來估計帝國主義政策的一反一正的作用的是潘東周先生。他說：

「帝國主義入寇中國以後，爲要輸出商品於中國內地，必須在這裏建築鐵路，開闢商埠。爲了榨取中國所有不值錢的勞動，和利用天然的寶庫，也開始在中國建設一些新式資本主義企業。中國產業革命，的確是帝國主義東來以後才漸漸發展起來。帝國主義把新式資本主義技術，移殖於中國，以開發中國。從此以後，對於中國的封建經濟，行割制，尤其是自然經濟，就給與一個極大的打擊，

使中國經濟組織，走上了新的途徑。」（中國經濟論一一至一一頁）

這一切——打破自然經濟，發展商品經濟，建立近代工業，都是帝國主義的積極作用。也是它僅有的積極作用。但是，對於農業經濟，它不顧移殖新技術於農村，設立近代農場，改良封建關係，只促進了商品的交換關係，在原有的生產技術下，努力加強商業資本和高利貸的搾取。正如潘先生所說，「帝國主義向中國農民收集原料，所用的方法，是與農村的封建地主，商業資本，互相勾結。他們利用自己的買辦（商業資本）向地主購買原料，加強地主的慾望，使他們殘酷地搾取農民，並且，趁着農民在水深火熱中，貸與金錢，迫他們將來賤價出賣農產。在這多重的束縛下，帝國主義不過利用地主商業資本，使農民在舊的生產方法與生產關係下，忍受着更殘酷的搾取。」（一一三頁）其次，帝國主義對封建軍閥開徵苛捐雜

第四章　新思潮派的強點與弱點

一　論爭的歷史價值

蘇聯開始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的爭論是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民族革命戰線內部，在那時已埋伏了非常嚴重的衝突。到後來矛盾掩蓋不住，終於鬧成了革命的大决裂。經過這次的大風暴，中國時局起了一大變化，民族解放運動暫時退了潮。這一劃時代的政治轉變，引起了民族革命戰線內部的嚴格的自我批判。爲什麼政局的變遷使民族解放運動遭受暫時的失敗呢？要回答這問題，就不能不檢閱民族大聯合的基礎與大革命失敗的社會

東北四省裏面，有許多腹地的農村，大體上雖還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可是商品經濟已日趨於擴大，尤其在附近沿海沿江的農村和市鎮，商品的生產和交換可說是日常生活的基調。全國的大城市，工廠林立，近代的生產，可說是主導的經濟力量。一句話，現在中國社會經濟形態是非常複雜的。經濟形態雖是十分複雜，但分佈的範圍最廣，數量比重最大的，仍是商品經濟。這過渡期經濟非資本主義經濟，也非封建經濟，乃混合着封建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過渡形式——半封建經濟。

這就是新思潮派的中國農村社會的分析。

王學文先生說：「在中國經濟中佔優勢，佔主要地位的，是封建半封建」。

潘東周先生說：「……封建殘餘的經濟形式，……在全國經濟的比重

中，佔着極大的優勢。」

我偏偏不避煩瑣，把新思潮派的分析，全面地加以考察，是要想讀者先來了解問題的提出是怎樣。從論戰發展到現在的十年間，中國經濟學界已有飛躍的進步。要是站在目前的理論水準，來評價當日各位戰士的觀察，當然發見許多幼稚，空疏，不夠的地方。可是我們如果拿出歷史的眼光，來追尋理論體系的發展過程，就不難承認他們對中國社會的了解，確有了劃時代的貢獻，有極大的歷史價值。在八九年前，社會科學剛在萌芽，中國經濟理論，也在草創時期，他們居然敢作大胆的嘗試，細心的分析，留下不少有價值的意見，這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可惜他們的批判者嚴靈峯任曙兩先生故意從中挑剔，提出了絕對相反的意見。新思潮派以為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所起的作用有正反兩面，正面是破壞自然經濟，促進商

品經濟，反面是維護封建勢力，阻滯民族工業，但嚴任兩位完全不顧「客觀事實」，一口咬定帝國主義是絕對地破壞封建勢力。新思潮派認為商品經濟只是過渡的形態，而嚴任卻一句武斷了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是二位一體。於是思想的戰場揭了幕，「各位雄糾糾的戰士，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得頭破血流，各不相下」了。

三　半殖民地觀

半封建性不過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半面，除了這半面以外，還有一個半面，就是半殖民地性。夢飛先生在著文（關於「中國經濟研究」的研究）批評任曙先生的時候，順便曾提及「新思潮派」的「缺點」，他這樣寫着：

「新思潮派對中國經濟性質估計，作了許多缺點。最大的缺點，是他們忘記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只看到中國經濟的半封建性，而完全忘記了它的半殖民地性。我們在這一章裏，分析過中國的半殖民地化過程。看不到這一發展傾向，必不能很正確的了解中國經濟問題。因此我們一面毫不容情的批判少數派的錯誤，同時也必須糾正新思潮的缺點。」(田中譯中國經濟論二五三——四頁)

夢非先生的這一段話，表示不滿意新思潮派，是因爲他們「完全忘記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我以爲說新思潮派對這問題是認識不足，在分析中表示了混亂，還比較來得確當些。要不然，一意認定他們「完全忘記了」它，我却覺得有點不公允，不是平心靜氣去觀察。「新思潮派」的兩員健將：王學文潘東周，並沒有「完全忘記了」夢飛先生所指出那個「缺點」。請讀他們的自白：

「中國經濟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王學文）

「……中國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中國是在國際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使全國成爲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潘東周）

我深信他們的思惟中並非沒有半殖民地的影子。只是在爭辯的開始，因爲對於方法論的把握不夠，和缺乏具體材料，使問題的提出，往往免不了空疏的痕跡，那是不可諱言的。所以說他們的認識不夠是可以，不把握問題的中心也可以，要是說他們連問題也「完全忘記了」，那我覺得無論如何是不公平的。

他們並且不只提出了空空洞洞的定義，對定義的分析和註解，也十分努力。

「說到中國資本主義，我們別忘掉帝國主義佔絕對的優勢。……在全國經濟

中，帝國主義有極大的勢力。爲了它對中國絲毫不肯讓步，爲了有廣大封建勢力存在，中國民族資本不但不能發展，全國國民經濟，也日趨於總崩潰中。」（潘東周）

「在沿海大城市與某些地方，的確有資本主義企業的存在，並且還有某種程度的發展。但具體點說，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形勢是怎樣呢？以地域的分佈而論，只存在於少數的城市和少數的地方，以發展程度而論，所謂中國資本主義，所謂中國民族工業，仍處資本主義初期輕工業的階段。」（王學文）

這是兩段有聯系的話。因爲帝國主義在中國享有種種特權，維持着殘餘的封建勢力，民族工業就遇着兩重難關。有了這兩重難關，有了這兩個大敵，土著企業也就不能普及於全國，並且只發展了若干輕工業的生產。

我爲新思潮申辯，無非要請讀者記住理論體系是發展着的，不是一下

子可以解答了一切。以半殖民性問題來說，因爲他們是認識不足，所以他們只提出民族資本當前的兩重障礙，對於中外資本發展的不平衡對中國國民經濟起着什麼政治的經濟的結果這問題，反輕輕地放過了。但這點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說中外資本的發展不平衡，他可以說中外一視同仁；你可以說華資比不上外資，他也可以說這是大小企業的競爭。不闡明這個關鍵，對中國社會的估計，我感覺還留下一個大空白。正因爲新思潮暴露了這點弱點，論敵也就向着這最弱的一環下攻擊。任曙的一視同仁論，嚴靈峯的大小企業競爭論，就是對新思潮派的有力的回答。

前線已開了火，各派的戰士再不能「躲在營中一聲不響」了！

第五章　機械派的觀點

一　社會性質問題的焦點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癥結，在對於帝國主義，民族資本和封建殘餘那三種社會勢力的相互關係的了解，所以這根本的認識，是幾年來中國思想界關於這問題的論爭的焦點。只有正確地了解這種相互關係，對於目前中國社會性質的估計，才能有可靠的保證。因此各黨各派對這問題的認識不同，就引起了各種各樣的政治主張，發生了種種式式的爭論。

關於那三種社會勢力的相互關係的了解，不出乎這兩種：（一）帝國

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關係，即帝國主義對封建勢力發生什麼影響，是破壞它，還是維持它？半封建說和資本主義說的分界，就在這裏。（二）帝國主義對民族資本是阻滯它，破壞它，還是推動它，發展它？中外資本發展的不平衡對整個中國國民經濟有什麼影響？

對這兩個問題，「新思潮派」已發表了一些朴素的意見。不論他們在個別問題的分析中，怎樣不夠，籠統，抽象，但在原則上他們總不失其正確性的。第一，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關係，他們堅決反對過度重視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進步作用的偏見，他們反對主張帝國主義絕對地破壞封建勢力的觀點。第二，對於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的關係，他們估計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雖然不十分正確，把中外資本當作兩種範疇來作辯證的觀察，雖不十分巧妙，但有一點，他們是很正當的，就是關於帝國主義對

民族產業所起的破壞作用。

潘、王的文章是後來任曙、嚴靈峯所批判的主要對象。對於潘、王所提出的半封建觀，嚴、任採着極端相反的態度，他們以爲帝國主義在中國絕對地破壞封建勢力，不是維持它，乃是破壞它，所以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第二點，因爲新思潮派的了解不夠，所以他們提出完全不同的對立意見來非難他們。他們看見中國民族工業有些微的發展，就當它是突飛猛進，並把中外資本都同等看待，認爲外資的發展，也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也無非爲了證明他們的中外資本「一視同仁」的見解。總而言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對立，是「新思潮派」和嚴、任等的基本對立。任、嚴的意見是往後幾年來爭論的主要目標，經過幾場劇烈的論戰以後，任、嚴完全暴露了他們所用的方法論的錯誤，和他們所

抱的見解與客觀事實不相符。他們的方法論和見解，非常機械，所以我贈給他們一個名銜叫「機械派」。

這裏我把任嚴「一視同仁」，也許有人會發生狐疑。任先生不是在他的大作上常常大罵嚴先生，嚴先生又不是同樣回罵他嗎？嚴罵任做「偵探先生」，任又罵他是「某個人」，任詈罵嚴靈峯爲「叛徒」，爲「機會主義」者；嚴又罵任爲「叛徒理論家」，「下流的經濟研究家」，「過左專家」，「小傢伙」；任譏笑嚴「東抄西襲」，嚴又譏笑任爲「創造大家」，「經濟通」，所說的是「先天理論」。

這樣你罵我我罵你，弄成黑漆一團，我們能不能誇大這點，性急地下結論，說嚴任的見解是根本衝突的。不能夠的。在瑣碎的觀點上，他們也許在鬧是非，爭正統，而且言辭上還夾雜了許多意氣話，但從本質上來

看，他們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嚴先生深信帝國主義要破壞封建勢力，任先生也這樣深信着。任先生承認中外資本要不分彼此，同等看待，嚴先生也這樣聲辯着。同時，他們又異口同聲說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交換關係的發展就等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這裏我不能夠詳細分析他們的次要的衝突，而只指出他們的基本觀點的一致和錯誤。

二 是不是帝國主義絕對地破壞了封建勢力

死抱着這見解，一點也不肯放鬆的，首推嚴靈峯先生。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懷着過分樂觀的結論。他看見帝國主義破壞中國的自然經濟，看見帝國主義無意地，客觀地在中國建設了一些資本主義企業，就幾幾乎用盡了

積極的動詞和形容詞，重重壘壘地對帝國主義歌功頌德，把它描寫成化地獄爲天堂的天帝。

「眞正豈有此理！帝國主義已是與封建勢力站在同一的水平線上，在歷史的地位上，毫不比封建勢力進步，在中國『擁護』『封建勢力』，何以『帝國主義資本的輸出』，又有『雖然在中國……建築……鐵路，……開辦……工廠……銀行……灌溉資本主義的種子到中國』的可能呢？既然『帝國主義的確也猛烈的破壞農村經濟』，則『農村的封建關係』，立足於什麼經濟基礎的上面而『並不破壞』呢？」（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一六七頁）

「我們知道（嚴先生他們）帝國主義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資本主義勢力，它對於封建的經濟制度，完全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固然，在一個社會內部，因經濟層次的複雜，在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強大的資本主義勢力有重大發展，有力的破壞了封建制度；同時在某些落後區域，還有新的微弱的封建

勢力。但是這裏重要的是在資本主義過程之中，封建勢力只是起了消極的抵抗作用，而日趨於沒落，並不是取積極作用，日漸擴大。」（同書一二四頁）

因爲他過分誇張了帝國主義的積極作用，而忽視它的消極作用，認爲金融資本是可以超脫衆生的救世主，在殖民地的國土上，建立資本主義的天堂，因此就乾脆地下結論：「帝國主義在中國是絕對地要破壞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要推動中國整個社會向着資本主義過程發展和擴大。」（前書序言九頁）

任先生目中的中國資本主義，是完全由外力所促成，內在的動力是不存在的。他把外鑠的作用，看作發展的基本原因。因爲他不了解外力只能影響而不能決定中國社會性質，於是肯定中國是十全十美的資本主義。要是有人根據事實，說帝國主義要鞏固中國的前資本主義關係，就斥爲「糊

途徑」了。他認爲要「把握着資本主義關係去理解農村土地問題」(中國經濟研究結論一四〇頁)。他主張「中國土地問題，主要的已不是封建關係而是資本主義關係了」(一四九頁)。他的「農村經濟問題的總結」(一五〇頁)是這樣的：

「因爲封建經濟久已處於崩潰過程中，而成爲殘餘的力量，資本主義則日益向上增長，取得支配；所以我們研究中國農村經濟，首先就必須把握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也只有把握着這一關係，才能理解其他一切的問題，才能說明農村的一切變動：從經濟問題起直到整個社會分化和政治鬥爭。」(一五一頁)

這幾段話表示出嚴、任兩先生對中國農村的了解，並沒有半點衝突。嚴先生說：「强大的資本主義勢力有重大發展」，任先生說：「資本主義則日益向上增長」。嚴說：帝國主義「有力的破壞了封建制度」。任先生

說「中國農村關係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像這樣一呼一應，一唱一和，除了表現的形式不同，除了字句上不同，還有什麽不一致的地方？

只見一般上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所處的對立地位，而不知在特殊條件下它們可以互通聲氣；只知農村偶爾也有近代大農場的發生，而不問它們從何而來，能不能自由發展；這樣見樹不見林的片面觀察，乃是機械論標本。因爲看不見或故意看不見一般和特殊的相互關係，或者把一般和特殊割裂出來，在方法論上一定是陷於機械觀的泥坑中，在實際上一定是抹煞當時當地的客觀事實。辯證法不承認一般和特殊有衝突。一般是特殊的一般，特殊是一般的特殊，彼此是相依爲命地聯系着。譬如說，英法是資本主義，日本同樣也是資本主義。這是一般的說法。但英法資本主義和日本資本主義是有極大差別的，前者較正常，依着一般的法則而發展，後者非

正常，帶上半軍事半封建的特質。這是特殊的說法。可是能不能根據這特質，就否定了日本資本主義的共通性呢？不能夠的。要尋找這特質，能不能在日本社會的發展過程以外下手呢？也不能夠。對中國社會的分析也應該一樣。固然資本主義是建築在封建社會的廢墟上，二者是根本不相容，一般上這一點也不錯，但爲什麼先進國能夠正常地通過了歷史過程，中國不能夠呢？爲什麼帝國主義在中國要維持和鞏固封建殘餘呢？這就是因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緣故。中國資本主義的種子在封建時代是循着停滯的道路發展，所以工業革命在中國是在外力的影響下才發生。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殖民地，奴役四萬萬中國人，宰割整個中國，以爲原料、商品、勞動、資本的市場。爲了執行這殖民政策，不能不摧殘中國的自然經濟，發展商品經濟，通過不

等價的交換方式，來支配中國農村，使它隸屬於世界市場。因此，中國農產只參加世界市場的商品流通。帝國主義給與中國恩惠也只限於這一點，除此以外什麼都沒有，所以社會結構內的封建生產關係仍被維持。他們向中國輸出的資本，用以開發中國的生產事業，不過是極小的一部分吧了。大部分却投於非生產的地產、住宅或毀滅生產事業的國債上。他們不要改變殖民地的社會關係來實現殖民政策，而要維持它，鞏固它。他們要豢養吸血的經理人——買辦，經過這買辦和商業高利貸資本、地主，達到收集原料和推銷商品的目的，或者親自出馬，作下鄉運動，來直接奴役千千萬萬農民。遭着這殘酷的搾取，中國農業是不能擴大再生產的。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中國經濟的商品化的確是趨於普遍了，同時也有了資本主義大農場，可是商品經濟不能轉化爲資本主義，大農場不能自由發展；即是

「封建的社會關係已經在崩潰，但沒有完全消滅；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已經產生，但是還沒有成爲支配的勢力」。這正是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中國社會的一面的特徵。這種相反相成，矛盾統一的現象，是機械論者所永遠不了解的。可惜在當時的思想界，任、嚴的批判者劉夢雲先生（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伯虎先生（中國經濟的性質），夢飛先生（關於「中國經濟研究」的研究）劉蘇華先生（唯物辯證法與嚴靈峯）和亦如先生（中國經濟問題），對於這問題，未曾全面地系統地對他們作有力的批判。這問題仍擱下來等待着再來一次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才作了最後的解答。

三 是不是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

任、嚴又根據別一種觀察，來作他們立論的證據，那就是商品經濟。

自從帝國主義東來之後，中國商品的交換，的確是日趨於發達了，不但在國內市場是如此，在世界市場也是如此；不但三家村的農產和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發生密切的經濟聯系；而且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世界一等大都會，也少不了中國的農產。任曙就是根據這等事實，先肯定商品經濟的存在，再肯定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肯定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請看他們的三段論法：

大前提　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

小前提　帝國主義是通過商品經濟來統治中國的

結論　所以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堅持着這種極端偏見的就是任曙先生。

「帝國主義底侵入促進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商品經濟底發展，就是資本

主義底發展」。

任先生又認定必須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才表示商品經濟的發展，卽表示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他深信「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問題的中心」（四三頁）。他用自己製出的統計告訴我們：（一）在一九二〇年前後，中國對外貿易的水準，和戰前的俄國相比，「已有同等高或較高的程度」。（二）並且，以江蘇、東三省、廣東、河北、湖北等爲中心，其水準不但「遠超過」戰前的俄國，甚至和戰前奧、希、塞「亦不相上下」。所以「中國經濟已經發達到俄國戰前的狀態，亦卽是有了十月革命的經濟基礎」（六〇頁）。

我們首先覺得這個演繹推理不能夠成立。所謂演繹推理，是由一個普遍的原則，來推演說明一件特殊的事情，它和歸納法是相反的，歸納法是

由特殊的事情歸納成一個一般的原則。但推論的關鍵在於大前提，大前提確當，小前提才有根據，以大前提和小前提爲根據的結論，才能站得住。在前面的三段論法中，大前提是不能成立的。爲什麽？因爲商品經濟不一定是資本主義經濟。誠然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一種，這是說，它們二者是有辯證的關係，可以互相轉化的，但我們不能說，單純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因爲它們並非屬於同一的範疇。譬如說，在商品經濟極發展的時候，農村和城市必進行密切的分工。於是在鄉裏，封建諸侯要强迫農民納錢租，無限制地對農民施以殘酷的搾取；在城裏，商人又由交換的中間人，而變爲生產的支配者。在那時候，各階級是向着兩極端分化，鄉裏只有少數農民變了農業資本家，其他都淪落爲工人，城裏也只有少數大商人和大行東變了工業資本家，其他又轉爲工人。到了那時

候，商品經濟才發展爲資本主義，卽是勞動力變成了商品，這過程才宣告功德圓滿。但它們究竟有什麽不同呢？這可以舉出兩個公式來說明一下。這兩個公式是表示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不同。前一種是：W（商品）——G（貨幣）——商品（W）；後一種是：貨幣（G）——商品（W）——貨幣＋新貨幣（G＋g）。在前一個流通公式裏，以商品爲始點，也以商品爲終點，貨幣只不過是交換的媒介物；大家爲着交換，才製造商品，拿商品來換金錢，也不過是交換的一段橋樑。在後一個公式裏，以貨幣爲始點，也以貨幣爲終點，是爲了販賣然後購買。爲販賣而購買，目的當然在獲利，譬如某資本家投下一定量貨幣於某種企業，經過生產過程，製造了商品，又經過流通過程，出賣了商品，收回更多的貨幣。總而言之，爲交換而生產，和爲獲利（剩餘價値）而生產，是不同的。爲交換而生產，所交

換的是各生產者的勞動價値，爲賺錢而生產，通過了交換，就中飽了資本家的私囊。目前中國農村，除了極少數經營地主以外，其他千千萬萬貧農佃農，不只被人剝奪了全部剩餘勞動，連一部分的必要勞動也被剝奪了，而流於飢餓線上。這種生產關係主要是商品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

也許任、嚴兩先生可以這樣說，資本主義經濟既是商品經濟的最高形態，爲什麼中國不可以通過國際交換關係而蛻化爲資本主義呢？不錯，原則上是可以這樣作假設的，但實際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農村，主要只是收買廉價原料和推銷過剩的商品，即是用不等價的交換方式來剝削中國農民。這樣的商品經濟，不過是「帝國主義變中國爲其供滋養分的附庸的一種表現，……決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底前途」（沈志遠先生語）。

四 能不能中外一視同仁

相信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還有一篇傑作，就是「中外一視同仁論」。對這論題最賣氣力，說得最澈底的是任曙先生，嚴先生也暗中附和，從另一方面來發揮議論。看了他們的堅決的態度和得意的筆法，似乎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在。因爲他們儘可不必堅持帝國主義破壞封建勢力的「進步」作用，也儘可不必強辯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屬於同一的範疇，但在中國的大城市裏，却有不少的新興企業。這些企業，有些是民族的，有些是非民族的，他們以爲民族或非民族的企業都是近代企業，都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如果把那些中外的新興資本合攏起來，中國的近代化問題豈不是有真憑實據嗎？這種心事從任先生的自白中最易看得明白。任先生說：

「既然在中國境內的華洋兩種資本主義是當作統一的中國經濟看待的，那麼帝國主義在華的銀行、工廠、商店、鑛山、輪船及鐵道資本等，再加上土著資本主義的銀行、工廠、商品、礦山、輪船、鐵道等，就足以壓倒封建經濟，而支配全國生活。」（八二頁）

所以他大聲向他的論敵提出質問：「國內的中外資本主義是否應當對立？」他斬釘截鐵地回答說：「絕對不應當。」（一一二頁）他認為「中國工人是不應該這樣那樣替別的人劃分界限的」（七二頁）。他大罵「號稱唯物派的中國經濟學者」，為的他們「只曉替資產階級寫財產清單，考查某些是國貨的，某些是非國貨的，以喚起他的富强的意識」（七四頁）。這是「多事的」「資產階級的應聲蟲」（七三頁）。總而言之，什麼國貨或洋貨的資本主義，只是一個空構，「中外一視同仁！」（九二頁）

嚴靈峯也是從「華洋不分彼此」的觀點下筆的。他深信「……不管帝國主義佔取全部統治也好，中國資產階級在刻苦可憐的掙扎中僥倖發展也好，總是使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勢力擴大。……」（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一二六頁）既然土產品與舶來品都沒有界限，都是同一的種屬，此起彼仆，都無關大體，那麼，無疑的這也是一視同仁論者的佳句。

最巧妙的，是嚴先生以大企業比外資，而以小企業比華資。因爲他發明了這樣的比較法，所以他覺得華洋資本，「僅僅存在數量的差別，而沒有質量的差別；兩者都是代表資本主義的勢力……。兩者之間的排擠傾軋，很類似於大企業和小企業的關係。因此，帝國主義自身便是資本主義的勢力，與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間並不存在本質不同的矛盾……。」（追擊與反攻）

任先生既認定不應把中外資本來「强分賓主」（七三頁），「混亂自己的觀點」（一一二頁），於是他就舉出許多種統計，來證明中國資本的發展。

第一，他相信帆船可以代表封建經濟，輪船可以代表資本主義經濟，因此，當他看到全國各海關船舶出入口噸數中輪船「佔優勢」的時候（即由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二六年，輪船的噸數曾由百分之八五，增至百分之九八，帆船却由百分之一五減至百分之二），他就斷定資本主義成分在國民經濟中已佔百分之九十八，封建經濟只佔百分之二。封建經濟只有百分之二，當然是無足輕重了。

第二，他相信錢莊和銀行的興替，也可以反映資本主義的盛衰，等到他發見一九一二年中國銀錢業投資的百分比中，錢莊由百分之六八縮至百

分之三七，而銀行却由百分之三二增至百分之六三的時候，他就肯定資本主義已佔百分之六三，而封建經濟只不過百分之三七。資本主義在全國經濟的比重中既佔百分之六十以上，當然是很可以自豪了。

第三，他相信土絲的生產，代表封建手工業，半廠絲和廠絲的生產，代表近代大工業。因此，他看到一九二八年，中國土絲生產，只不過佔百分之九·七，而廠絲半廠絲却佔百分之九〇·三，也要肯定資本主義成分在工業生產中佔百分之九十以上。以十來比九十，封建因素當然是不足道了。

然而中外資本是否可以不分界限呢？要答覆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可以講得完的。從原則來看，這個前提是可以成立的，要是一個獨立國家，有了自力更生的主權，有了保護民族產業的政策，那麼，不論外資的輸入

採着什麼形式，或借用任先生的話來說，不論是「投貨」或「投資」，都可以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爲這些國家的最高主權，操在幾個外國客卿或顧問官的手上（他們是金融寡頭派來的合法奸細），外資又握着工業，金融，財政，交通的命脈，所以資本的輸出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結果，造成了相反的社會意義。關於這一點，這裏可以再來說明一下：

第一，從一般的規律來說，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是一對死對頭，不能夠並立的。因此，中國民族工業想自由發展，必須肅清一切封建關係，建立統一的市場，統一的國家，統一的政府。過去開明的民族資本，積極參加英勇的民族解放鬥爭，就是爲了解放這些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的束縛。可是在另一方面，國際金融資本的要求恰恰是相反的，他們力謀支持國內

的半封建勢力，好作他們支配中國的柱石。

第二，嚴靈峯先生曾說，「農業殖民地」和「工業宗主國」，是國際分工的表現。這種分工，如宗主國內有農業和工業的分工，是一樣的。也許嚴先生要歌頌這種「國際合作」的精神，可是這種分工事實上是最不自然的，是極不平等的。由於這一「國際的分工」，殖民地經濟只畸形地發展了農業經濟的若干部門，例如過去「友邦」在滿洲獎勵種植大豆，目前在華北獎勵種植棉花等，始終只是爲宗主國打算盤。這種經濟的畸形發展，對於殖民地有沒有福利，是不在他們的視線內的。在工業方面，這種國際的「合作」政策，也只發展了礦業和若干輕工業。前者只爲宗主國製造工業原料，後者也只爲着與土著資本直接爭市場，他們始終不願發展殖民地的機器工業。總而言之，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開發工業原料，建

立某種輕工業，並不是爲了完成殖民地的工業化過程，乃是爲了搾取成千成萬的工農大衆的低廉勞動力。這種「國際的分工」，是貧困的根源，而不是繁榮的標幟。

第三，凡讀過經濟學入門這類書的人，都了解資本再生產是什麽？打個比方，資本好像一個雪球，越要打滾，雪球也就越大。在經濟學上，資本的打滾，叫資本的擴大再生產。但是爲要保證擴大再生產的圓滑進行，資本家不要把剩餘價值完全消耗，而須要留下一部分，作爲擴充資本的用途。中國國民經濟想要超過目前的生產水準，或者至少要維持目前的水準，企業家必須把他們所得的利潤，除了消費一部分以外，其餘都用於發展生產事業。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收入最豐厚的當然是大腹便便的洋大人，他們從中國剝削得來的超額利潤，並不是留在當地作爲擴充企業的使

用，而是把大部分運到宗主國去了。（民族企業家目擊自己工廠的飄搖不定，也極少關心企業的擴充。）利潤取於中國而不用於中國，不是更加促進中國國民經濟的崩潰，使中國經濟陷於萬刼不復的絕境嗎？

第四，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主要特徵之一。金融資本能夠建築起全世界的經濟搾取網，也大半依靠資本輸出的功勞。可是到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三期，尤其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以後，資本的輸出已差不多完全梗塞了。瓦爾加說得好：「資本輸出於外國，只以外交政策和準備戰爭的必要爲依歸（例如英國對阿根廷，法國對羅國的軍事借款，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借款），因此在世界經濟恐慌時代，作爲帝國主義的主要基礎之一的資本輸出，是已經中斷了。這是怎樣動搖着資本主義的基礎呢！資本輸出的中止，就是現在蕭條階段的重要特點之一。」（大恐慌及其政

治的結果八三至八四頁）金融資本對國際借款的吝嗇，是因爲他們對自我的生存，已失了信心，他們的心目中旣沒有自我存在的希望，誰敢再冒險把資本投於殖民地的生產事業。如果有人以爲中美棉麥借款和航空借款，中英航空借款以至最近在中日外交談判中轟動一時的中英借欵，是生產借款，那不是瞎子，於是害了白內障的明盲。

總之，在殖民政策的高壓下，中國休想與先進各國，同登資本主義的大堂，要是這樣的社會，也可稱爲資本主義社會，毋怪乎劉鏡園先生也要起來提出抗議，遮遮掩掩來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的定義了。

以中外企業的競爭，來比喻大小企業的競爭，也是說不過去的。因爲在自由競爭時代，企業的競爭是技術落後的企業與技術進步的企業間的競爭，大家競爭着改良技術，競爭着提高生產的速率。這樣的競爭，足以促

進資本主義生產，是進步的社會現象。但在獨佔時代，獨佔組織往往用許多野蠻的手段，對非獨佔的組織，施以壓迫，只爲的保證財政資本的獨佔利潤。中外企業的競爭，不但與大小企業的競爭不相同，而且與獨佔組織對非獨佔組織的競爭也不相同。因爲在同一資本主義國內，企業的競爭者在法律上政治上都一律平等（至少在形式上），但是在殖民地裏面，政治經濟的自主性是沒有的。孫治方先生說：「大概我們底理論家在外灘散步時，只見壯嚴宏大的匯豐銀行和陳舊矮小的中國銀行底建築，只見到這一點的差別而忘記了前者有外交部所保存的，一世紀以來兩國政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做根據，有對面江心中停泊的軍艦做後援，而且忘記了這兩個大銀行都是建築在大英帝國管轄下的公共租界的。」（論戰一八四頁）嚴先生讀了這有趣的「反攻」，大概也該首肯吧！

任先生以交通工具、銀行、廠絲的生產，來證明中國社會的性質，可說是百分之一百的機械論觀點。因爲他只見量而不見質，只見形式而不見內容，只見一般而不見特殊，只見靜態而不見動態。同一類的生產工具，同一類的銀行，在獨立國家裏代表着甲種社會意義，在半獨立的中國，又代表着乙種社會意義。譬如在英美各國，交通工具（海、陸、空）與銀行的發達，可以反映（並非決定）產業的發達；但在中國，交通工具（航船、鐵道、飛機）往往是金融資本吸取滋養分的喞筒，新式的銀行，往往是外資控制中國產業或經營對外貿易的手段。這種只知固執某種東西的形式、數量，一般，而不追尋某種數量的性質、某種形式的內容、某種一般的特殊，乃是機械論的標本說法。

第六章　似是而非的修正

一　機械派的自我批判

任曙、嚴靈峯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分析，本來就建築在浮沙之上，經不起風吹雨打的。那是當然的，把帝國主義經濟和民族經濟，都同等看待，一視同仁，那裏會看見中國經濟發展的傾向？胡亂地把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混而爲一，以爲商品經濟的發展，就等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那裏會認識中國社會的性質？一昧咬定一個死公式，以爲資產階級在歐美推翻封建制度，因此帝國主義在中國也一定破壞封建勢力，又那裏會明白帝

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方式？

這種經濟的分析，經過了幾次大論辯後，就在光天白日之下，被揭破了它的廬山眞面目。這一派的理論家，要是再來擁護自己的根本立場，就不得不對任、嚴兩先生取着反對派的態度，即在表面上也批評一下任嚴，而骨子裏却將同一的觀點，用別的一種形式，表現出來。一提起這種論戰的藝術，使人不能不想起劉鏡園先生來。劉先生在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所發表的評兩本中國經濟的著作（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就是對於任、嚴的觀點，採取反對派的批評態度，要從「破」中來批評舊的經濟分析。同年十二月十一日，他所發表的中國經濟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預測（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二輯）一文，就是正面分析中國經濟的性質，其趨勢，及其出路，要從「立」中來建築新的理論體系。

劉先生能不能完成他們所期待的目的，那是另一回事，可是他以新的姿態，以新的論爭形式來擁護同一的政治主張，那與嚴、任兩先生的動機，是絲毫沒有衝突的。

先從劉先生對嚴任所採的反對派態度說起吧！

任曙先生在其中國經濟研究緒論一書裏曾說中國經濟已發展到戰前俄國的水準，中國資本主義，可與各國資本主義並駕齊驅，所以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嚴靈峯先生在其中國經濟問題研究，追擊與反攻等著中，說帝國主義會促使殖民地趨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封建半封建的經濟，已日趨於崩潰；又說帝國主義排擠民族工業，只是國民經濟趨於發展的證據，先進國發展重工業，後進國發展輕工業，也只是國際分工的結果；因此他也下了同樣的結論：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劉先生是反對這樣的武斷的，他寫道：

「……假如有人認爲『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中國工業的發展是絕對不可能』……這是錯誤的，但任君之走向另一極端，認爲資本主義可以無礙或阻礙很少的在中國發展，亦絕不是事實。」（評兩本著作）

他在別處又寫道：

「只有任君才沒有抓着問題的中心，否認帝國主義妨礙中國工業發展，否認中國問題的中心是民族解放與土地革命，因此得出一些安那其的結論。」（同文）

對嚴靈峯先生，他同樣也堅持着反對的態度，他說：

「我認爲帝國主義在中國，是摧殘而不是幫助資本主義之發展，這在嚴君或者認爲與史太林派一致。確實在這一點，我不僅與史太林派，而且與資產階級的各派一致，因爲這是客觀事實的認識，這完全不妨礙互相鬥爭之不可調和。」

（預測）

「……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航業、鐵道，排擠民族資本，並不證明中國國民經濟更趨發展。……至於外國在華的航業、工廠、銀行、鐵道、投資，牠的發展正是中國國民經濟的損失。」（評兩本著作）

但是劉鏡園先生不僅承認帝國主義阻礙着中國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並且還「保存着中國的落後關係」。這又是劉先生和任、嚴兩先生所見不同的證據。請看他的自白：

「我們承認主要的是國際帝國主義阻害中國的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但是問題在此還沒有完結，中國現有的社會結構：軍閥制度，官僚階級(?)，土豪劣紳，商業資本，高利貸者，這些階層的結合，亦是阻滯社會進步的勢力。但他們却與帝國主義沆瀣一氣，對帝國主義極力表示無抵抗，至多是『以夷制夷』的抵抗，帝國主義亦維持他們整個階層，不是破壞他們。」（預測二一四至

五頁）

嚴先生以爲不必管地租的形式或程度是怎樣，其本質總是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而劉先生却提出了不同的主張，認爲：「……地主和高利貸者將中國農民的一切都剝奪了，……只留下他最少維持生活的生產品。這正是說明中國資產階級所用的是封建剝削形式，所以農民沒有改良生產的可能，所以資本主義的農業在中國不發達。」（評兩本著作）

這裏顯然有了兩個觀點，嚴、任說帝國主義是「幫助」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劉先生說帝國主義是「摧殘」民族工業；嚴、任說帝國主義「破壞」了中國的落後關係，劉先生說帝國主義「保存着」它。

二　並非澈底的批判

可是奇怪得很，劉先生一面對任、嚴兩先生提出了修正意見，一面又修正得十分不徹底；一面要拯救機械派對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的曲解，一面又再一次宣佈機械派的理論的破產。這樣枉費了心機，也許劉先生要覺得可惜，無可奈何，可是理論與客觀事實不相符，那又有什麽法子好想呢！

瞧吧！劉先生是承認帝國主義阻滯中國經濟的自由發展的。但是外力怎樣阻滯着它的發展呢？在第二章討論少數黨與多數黨爭辯中國革命的時候，我已批評過托洛斯基的見解。他認定中國工業不發達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關稅的不自主，所以民族解放鬥爭唯一的任務，是要推翻海關的壟斷。這點劉先生也無條件加以接受。

「實際的情形是：帝國主義是阻礙中國經濟發展之一最重大因素。關稅（不幸任君在那本著作中無一字提及）的不自主，是中國工業不發達的一個最大原

因。」（評兩本著作）

不錯，關稅政策也是列强宰制中國的一個因素，但不是極重要的因素。它們支配中國，主要的不是通過海關制度，而是通過他們在中國所有的一切經濟命脈，這經濟命脈就是外國銀行、工廠、礦山、鐵道，以至擁護這些經濟利益的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要是單靠海關制度，列强還不能順暢地控制中國。關稅制度，對於民族解放，既沒有決定的意義，那麽我們縱使爭取了關稅自主，而全國經濟的命脈，仍在列强的指揮操縱之下，中華民族也決沒有翻身的可能。

主張海關制度，對民族工業的發展有決定作用的人，一定把反帝的任務，限於要求關稅的自主，把反海關運動，當做反帝國主義的最高目標。約瑟夫早已說過，只想「取消不平等條約」，只想「收回海關」的，是「張

作霖陛下顧問的觀點」，因此，急進的政論家只好做了土著資本的尾巴。這種不幸，也許劉先生當初是意想不到，可是實際上的確是如此，不折不扣。這無怪有人振振有辭，說他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的見解」了。（評劉鏡園的中國經濟新論，論戰第二輯）

第二，劉先生也不否認帝國主義保存着中國的落後關係。這所謂「落後關係」，劉先生是指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商業高利貸資本等等，他們對農民不僅要搾取全部剩餘勞動，連他們的必需勞動，也侵犯了一部分。

接着，問題就來了。劉先生自己問自己：

「這些是什麼勢力？大多數人說他封建勢力，他們是封建勢力嗎？」（預測二二五頁）

依常理說，他們當然是封建勢力，可是劉先生却堅決的說他們並非封建勢力。他寫着：

「普通所了解的封建勢力，是指與資產階級對立的特權階級——諸侯，貴族，領主等。可是中國因爲土地買賣自由，這一階級早已不存在了（如革命前的俄國，領主的土地不是從買賣而是從世襲得來，所以顯然是封建勢力）。政治上的封建勢力在推翻滿清後卽不存在。所以如曹錕，黎元洪等都可以做大總統。」（預測二一五頁）

不求內容，只求形式，不問本質，只問現象，乃是機械的形而上學的思惟的產物。劉先生對於中國封建勢力的觀察，正中了這一思惟方法的毒。中國封建勢力的有無問題，不取決於形式或現象，卽不取決於封建諸侯存在與否的問題，而取決於內容或本質，卽取決於目下中國社會是否帶

有封建半封建性質的問題。形式上諸侯貴族存在與否，他們與資產階級對立與否，並非問題的核心，必須觀察中國社會的生產關係，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既然劉先生也不否認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商業高利貸是「落後關係」，是「阻滯社會進步的勢力」，請問：他們是那種生產關係的社會勢力？從生產關係上來觀察，軍閥、地主、高利貸、形成一個集團，貧農、佃農、一部分中農，又形成一個集團。前一個集團，靠土地私有制的特權來維持生存，後一個集團，因爲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而甘受剝削。所以半封建地主和半飢餓農民的對立，就是中國農村經濟的癥結。同時，政治上的封建勢力，也並非取決於王朝的有無。英國日本還是君主立憲國，但稍有政治常識的人，決不至瞎說英國日本是封建社會。中國自從推翻了滿清政府以至今日，王朝已遭了最後的一擊，再不能復起，可是新的

舊的軍閥，在本質上都是封建勢力的上層代表。

三　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

然而，不論劉鏡園的修正怎樣不夠澈底，別有用意，他究竟不能不公開承認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工業的阻滯作用，所以「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幾十年」，仍非常「可憐」；帝國主義維持着整個地主階層的基礎，又使「資本主義農業在中國不發達」。但這樣的社會叫什麼社會呢？任曙、嚴靈峯及其他同道者，都說它是資本主義社會。其實工業農業的資本主義關係是這樣可憐：「南京武昌等城市沒有自來水的供給，像甘肅那樣的省份，還沒有鐵路，像四川那樣的省份，只有九五・六三基羅米突鐵道………」，「封建的與半封建關係無疑的是强有力的」，又怎能叫它做資

本主義社會？但是機械派是根本不了解中國社會的過渡性質的，於是劉先生只好製造新名詞。他說道：

「我們認爲中國現在不是一封建社會，而是一資本主義社會——落後的資本主義社會。」（預測二七頁）

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名詞之下，加上一條引線，引出了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不過「落後」二字，還須附加註釋的，所謂落後的資本主義是什麼東西呢？

「中國今日的社會，是資本主義關係佔統治地位。他是什麼樣的資本主義？是買辦資本主義。繼之而起的應當是民族資本主義……。」（預測三七頁）

原來劉先生說了半天，左手推開任曙，右手拉倒嚴靈峯，遮遮掩掩的，半吐半露的，只說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卽是「買

辦資本主義」。

所謂落後的資本主義就是買辦資本主義，劉先生眞不愧是一個創造大家。他不斷玩弄新名詞，其實有什麼用處呢？我覺得這是劉先生的變戲法。什麼是變戲法呢？變戲法是把一件東西變成別的東西。例如一根棍杖，可以變成一條蛇，一粒米，可以變成一杯米。但是世上並沒有這樣變幻無常的道理。「魔術師不過是預先將蛇和滿杯的米藏在觀客所沒有想到的一個地方，到了臨台的時候，祕密地搬出來，暗中和棍杖之類換掉了。巧妙地蒙混過觀客的眼睛，戲法就玩弄成功。」（艾思奇：大衆哲學一一五頁）

我爲什麼說劉先生是玩變戲法呢？是不是劉先生暗中把蛇和米藏在觀衆留心不到的地方，暗地裏搬出來，換掉了棍杖之類，來蒙混觀衆的眼睛

呢？是的，劉先生的確具有這種心腸。不過劉先生所玩的不是蛇、米之類的東西，而是一個經濟學的名辭——「商業資本主義」吧了。他不是把買辦資本主義註釋爲落後資本主義嗎？原來買辦是一種商品交換的媒介，買辦資本，就是商業資本的變種。因此劉先生玩來玩去，只不過把商業資本主義，用別的名字表示出來，正與魔術師把蛇換掉了棍杖之類，異曲同工。

資本主義就是落後的資本主義，落後的資本主義就是買辦資本主義，買辦資本主義就是商業資本主義（這名詞劉先生不敢公開說出來），劉先生的用意何在，難道明眼人看不出來嗎？

看破了變戲法的「變」，並非眞的變動，「只不過換掉了一下位置……至多也只能承認是位置上的移動」。看破了劉先生所玩的中國社會定義的「變」，也同樣不是眞的要澈底修正托、嚴、任的觀點，也只不過換掉

了一個名詞，至多也只能承認是用語的不同，並非觀點有什麼差別。對他這種用心，鍾恭先生的批評是最恰當：

「說中國經濟是商業資本主義經濟，這實際上表示出了根本上劉鏡園和任曙嚴靈峯沒有絲毫的不同，因爲後者見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就立刻斷定了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把一切商品的關係，看做了資本主義的關係！不過爲得要把戲法變的更巧妙些，劉鏡園不說這是商業資本主義，而說是落後的買辦的資本主義，並且更聲明說，這不是眞的資本主義，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不是民族資本主義。」（論戰第二輯七頁）

我覺得劉先生還不夠澈底，如果「商業資本主義」眞可算得是資本主義，咱們中國不要等待今日才算是資本主義，秦漢以來已經是這樣的社會了。因爲「中國太古時代，商業資本主義已經存在，它早已打破了封建制

度及其殘餘關係，再加上政治上的變動，封建關係已變了殘餘的殘餘，政治上經濟上都沒有何等意義，所以在政治上經濟上中國現在是一資本主義國家。」（陳獨秀先生語，引自潘東周的中國經濟的性質，田中譯中國經濟論四頁）。不只陳先生有這樣的卓見，拉狄克在參加蘇聯托派組織的時候，已早有這樣的倡導了。所以劉先生的變戲法，變來變去，只玩弄名詞，改頭換目，實質上他與其同道者是沒有不同的。

不過我還不能說劉先生與其同道者沒有半點不同。他說中國是一落後的買辦的資本主義，在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國際帝國主義阻礙中國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封建半封建是强有力的」，因此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估計，自然不如任、嚴那樣直捷了當，一下子就跳上超時間超空間的社會主義運動。他說中國目前革命還是民主革命。他在評兩本著

作裏寫着：

「任君對於將來中國革命性質的了解，是不正確的。任君主張（嚴先生也同樣主張——幹）中國革命的民衆應當叫出打倒資本主義的口號。……就其客觀的任務說來，中國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即對外爭得獨立，對內實現土地革命，這二者爲革命的主要內容，而不是推翻資本主義，廢止私有財產。」

機械派的反帝觀，不過要求海關的自主。這點暫且不去管它。對於我們別有興趣的是土地革命。劉鏡園先生所標榜的土地革命是什麽樣的土地革命？消滅那一階級的土地革命呢？是不是要消滅封建階級呢？劉先生是不承認中國有封建勢力的存在。是不是要消滅市民階層的土地革命呢？那樣奇怪的土地革命實際上是沒有的。

「但是什麽人能夠貫澈這種革命呢？」——劉先生自己問自己。

「我們知道中國資產階級在上面與世界財政資本，有有機的不可分離的關係，在下面與封建的剝削形式，也是密切的聯系在一起；換言之，中國各派的資產階級都不能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和解放農民，只有工人才能這樣做，所以革命將是這一階級的政權，這一階級只有在取得政權後，才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六頁）——他自己回答自己。

原來他所認識的農業革命，是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運動，與佔國民總數十分之九的農業人口，倒沒有相干，他們是不革命的，只有向工人階級手裏拿得土地。可是，我們有兩個疑問，要請教於劉先生：第一，只要讀者不是健忘，總會記得劉先生曾說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還要等待於將來；沒有民族工業，當然也沒有強有力的產業工人，沒有強有力的產業工人，又怎能單獨靠他們來完成革命的任務？第二，讀了劉先生的話，他

一字也不提農民在民族解放中的作用。要是否認下層社會勢力的聯合，把廣大農民，摒在革命戰線以外，試問：「工人才能這樣做」的「做」，是腦子裏的「做」還是實際上的「做」？解放工作能不能完成？

總之，我覺得劉先生的那兩篇文章，並沒有眞正修正過機械派的觀點。只覺得有許多事實，使他們不得不承認，儘管他們不能不尊重事實，但對於機械派的政治觀點，始終不肯放棄。不過他們越要拿事實來附和自己的觀點，就越弄得一團糟。所以劉先生並沒有解答了什麼問題，他的：「這一企圖仍舊是徒勞的」。

第七章　金融資本與農業生產關係

一　舊問題的新意義

在一九三四年以前，中國思想界對於社會性質的論戰，還留下兩個基本問題，要等待將來給與更具體的回答。有人說，國際資本壓倒了中國資本，其意只可以說中國資本主義的道路不是由本國資本家掙扎得來，而是由外國資本家越俎代庖而來的。但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依然有它的遠大的前途。與這問題息息相關的，又有一個有趣的結論：他們見了帝國主義溝通了，促進了中外的交換關係，馬上就肯定帝國主義也改變了殖民地的

農業關係。財政資本在東西各國，都「一視同仁」地，把整個世界造成一個純正的資本主義機構。這是幾年來各黨各派的文化鬥士所爭辯的焦點。這些論題，在一九三四年，又捲起了一場大風波。論爭的主題，特別側重於金融資本與中國農村的關係。在論戰史上，可名爲「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參加辯論的份子，以中國經濟和中國農村這兩個單位爲對抗的中心。在前一派中，有王宜昌、張志澄、王景波等；在後一派中有錢俊瑞，陶直夫、薛暮橋、孫冶方、余霖、周彬、趙槑僧等。日人玉木英夫也站在這一邊。「中國經濟派」認定中國農業生產中是資本主義佔着優勢，中國農民沾了金融寡頭的恩惠，已登上近代的殿堂。「中國農村派」認定帝國主義只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只通過交換市場，支配了中國農村經濟，但農業依然停留在過渡時期，停留在由封建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

這是半封建的特點。

不同的立場，得出不同的經濟觀察，不同的經濟觀察，得出不同的政治結論。然而奇怪得很，他們各人都自認是正統派，而別人的却是冒牌的私貨。我們儘可不管正統不正統，儘可不管冒牌不冒牌，只問各種互相對抗的見解，究竟與事實符合不符合。這個符與不符，是最後的測量器。可是有一點，是很耐人尋味的：爲什麽論戰出現於一九三四年，論辯的題目又以中國農業經濟爲主要的對象呢？當然，這並非是偶然的事。據我個人的觀察，至少也有兩種必然的條件存在。

請讀者先看一九三四年前後幾年的中國農村狀況是怎樣的。

中國農村，一向都是帝國主義的輸血管。帝國主義通過中國的買辦、地主、商業高利貸，以不等價的交換，來採購原料，推銷商品，早已造成

了摧毁農村的根本條件。自「九一八」以後，由於民族危機的日趨嚴重，水災旱荒與世界經濟恐慌的雙管齊下，農村更陷於總崩潰的大火口（據統計，近幾年農村因災荒損去了一百萬萬元，上海一地六種主要農產價格，由一九三〇至三四年，竟跌了百分之一六・〇一）。在平常時，爲了超經濟的搾取，農村資金已源源向城市流出。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加上各國對華傾銷農產的加緊與水災旱荒的交織，農業生產更爲退化，資金外流也更爲嚴重，結果資金於是由農村流入於市鎮，再由市鎮流入於城市，最後以至集中於城市的城市——上海。（由一九三一年——三三年，上海存銀由二萬六千六百萬元增至五萬四千五百萬，三年間多了一倍。）

集中在城市的現金，因爲城市工商業的凋殘，除了拿出一部份做投機事業，購置地產以外，其餘的遊資，在城市也找不到出路。於是銀行投資

的轉向問題，那時乃突然沸騰起來。復興農村！救濟農村！一時成了最時髦的口號。這一運動，開始於一九三三年，而狂熱地宣傳於一九三四年。於是乎引起不少改良主義的信徒，在那裏虛構新農村的美夢。他們以爲現金流入內地，不僅可以拯救水深火熱的農村，發展農業的生產，並且可以促進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他們雖然明明知道，帶着十分濃厚高利貸性質的銀行資本，只好做投機買賣，不配談發展生產事業；他們也明明知道用於農產運銷和農產抵押的農村放款，只是高利貸商業資本的變相。可是他們的視覺中，似乎並沒有這麼一回事。其實稍有一點經濟學常識的人，也都會看得出這一次銀行資本的「下鄉」運動，只不過是爲垂死的農村吸血鬼們，撑一撑腰，或者更進一步，銀行家自己直接代替他們，來統制農村，爲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完成淸道夫的使命。然而帶着有色眼鏡的農

村半封建性的人，因爲在過去沒有完整的結論，不能夠在理論上，在歷史上，在目前發展的傾向上，指出半封建的全貌。那是極其必要的，並且，是極其艱巨的工作。說得不具體，不條理，當然會惹起對方的攻擊，引起同派的自我批判，因此，半封建性的觀察，必須來一場大惡戰，拼個你死我活。到了一九三四年，於是一向擱着的問題終於提出來，經過一年的「追擊與反攻」，對於未解決的問題，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收獲。

在理論上，農業生產關係應該要再來一次清算，一來可以打着敵人的最後一道防線，二來可以嚴守自己的陣地。王宜昌、張志澄復活了嚴靈峰、任曙的見解，而錢俊瑞、薛暮橋也把問題提到一個新的階段。這農業理論本身的辯證過程，也是我們檢閱這次論戰所不能放過的要點。要是不了解它，以爲問題在兜圈子，學者在耍花槍，就不知道理論本身在每個階

段上都有那階段的特點，卽使前後同樣爭着一個問題，都也有深與淺，完全與不完全的不同。

辯證法的發展，也在理論的發展上，反映出來。

二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我想不健忘的讀者，恐怕還記得任曙先生的方法。因爲他相信帆船可以代表封建經濟，輪船可以代表資本主義，於是大查海關表冊，終於找出由某年至某年，帆船和輪船進入口的數目，曾由一五與八五之比改爲二與九八之比，所以斷定封建經濟目前已達到零點。我們叫這樣的看法做機械論的看法，是因爲它只見外表，不見裏面，只見某種生產工具在數量上的增減，而不見這數量的增減上所隱藏着的社會關係。再拿別的交通工具，

譬如公路、航空來說吧。近幾年來，與內戰直接有關而開築的九萬公里以上的公路，你敢說是中國近代化的象徵嗎？同樣，在近幾年來，與帝國主義在遠東備戰有關而成立的中美航空公司，歐亞航空公司，也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所要求的結果嗎？你要是這樣只見外面，不問底細，那你又附着任先生的驥尾，再作一次機械論證的標本了。

嚴靈峰也說過這樣的話：

「生產方法的改變主要的就是表現於技術的改變。……我們要劃分社會發展的各階段，必須從事於研究歷史的各時代所採用的勞動工具如何？」（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七頁）

任曙和嚴靈峰兩位先生的方法，又糾纏着王宜昌先生。王先生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的結論，主要是他的方法害了他。所以，要想知道王先生對於

中國農村的結論，先要知道他的方法；想知道他的方法怎樣支配着他的思惟，先要知道生產力是什麽？生產關係是什麽？什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交互作用？這些都是歷史方法論的基本問題。

這一次論戰的導火線，是王宜昌先生在大公報所發表的農村經濟統計應有的方向轉變。這篇文章引起薛暮橋先生寫了一篇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方法問題，錢俊瑞先生寫了一篇現階段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任務。後來王先生又寫了論現階段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和關於中國農村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兩篇，於是大論辯就開始了。「中國經濟派」的主將王宜昌怎樣了解生產力呢？

他說：生產力就是「人對自然的技術」，「人和自然的關係」。又說：「社會的進步發展，是人類和自然的矛盾中，人類更服從而更征服自然。

人類征服自然的程度，以技術或生產力表現出來。」（論戰一一一頁）

最大胆的，最有系統的把「中國經濟派」對於生產力的觀點，表示出來的，是張志澄先生，他在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一文，指出：

「……所謂生產力不外（一）代表生產手段的物——物的天然力，（二）代表勞動的人——人的勞動力，（三）科學技術——科學的能力。

「……王宜昌先生把生產力解做人對自然的技術範疇，……並未犯有何等重大的錯誤。」（一二八——九頁）

總括一句說，生產力是技術。但張先生曾明白說過生產力還有勞動對象和勞動力，生產力既有三種要素，又怎好撇開其他二者不提，只以技術當作生產力呢？這也許是他們以爲非這樣不能夠表示技術的決定性吧！但是看重技術，不只是「中國經濟派」諸君，卡爾已先他們幾十年就諄諄不

倦地指示我們了。他指出，要明白已死亡的動物、植物的種屬，必須知道它們的遺骨構造，要明白過去的社會結構，必須知道勞動手段(技術)。他又指出，要區別經濟上的各時代，必須曉得它們怎樣生產，用什麼器具來生產。因此他就下結論：技術不僅是社會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社會關係的指標（參看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他再說手挽車子產生了封建社會，蒸汽機關產生了資本主義社會。伊里奇也說電氣化產生了社會主義。讀過他們——社會理論的創造者——的遺作，我們一定深信他們並沒有絲毫過小估計技術的意義。可是他們雖然很正確的估計了技術的價值，同時也並沒有把技術當作生產力的同義話，只是說每個社會都有那社會的技術水準。而且事實上，不論技術是怎樣重要，要是我們了解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相互關係，就一定承認技術的作用是有一定的限度。關於這一定的限度，

卡爾的話最足以表現出來，他說：

「在生產過程中擱着不用的技術，是無用的。不單是無用，而且，由於物質的新陳代謝作用，而漸漸腐爛了。鐵可以生銹，木可以腐爛。不能耕織的棉紗，只是廢物。只有靠生動的勞動，才能把這些東西由無用的變爲有用的，把它們的可能的使用價值變爲現實的使用價值。」（資本論第五章）

他的話是說，缺少了人類，缺少了勞動力，技術是死東西，是無用的東西，對於生產關係，不會發生實際的效果；他的話是說，技術只是構成社會關係的可能基礎，必須在勞動過程中，它的可能性才變爲現實性。卡爾曾說工人階級是最大的生產力；伊里奇也說過工人，勞動者是全人類中首要的生產力，這是不難明白的大道理。

現在我想用些具體的事實來說明一下。在一切有階級的社會裏，靠下

層社會的剩餘勞動活着的上層，他們所關心着的，不是技術，乃是每天爲他們製造剩餘勞動的人。讓我把論題放闊些，先從前資本主義說起吧！在奴隸社會裏，奴隸（勞動者）是生產手段的一種，是奴主的私有財產。所以奴隸整天工作的所得，全部都奉獻於主人。封建社會的農民，具有一切生產所用的工具，所缺少的，只是土地，所以地主靠着土地的私有來徵收地租。在這些社會裏，奴主和地主，對於技術是不會關心的，他們所關心着的是鞭撻奴隸的鞭子和土地的獨佔。要是鞭子鞭得重些，奴隸可以生產多點東西，要是土地的獨佔，能夠保持得住，也可以世世代代的保留身分的關係。

接着封建社會而來的是資本主義，必須等到農民失了生產手段，靠着出賣勞力以維持生活，資本主義才具有先決的條件。這條件在封建社會末

期就已經具備了。在那時候，商業資本家變了工業資本家，他們由支配流通過程，進到支配生產過程，由間接的搾取進到直接的搾取。那是工廠手工業時期的開始。原來工廠手工業的技術，和封建手工業，並沒有差別。但在工廠手工業中，生產是分工合作的；要是一切勞動力，能按着這分工合作的原則合攏起來，合攏來的力量，比個別勞動者合攏來的同等力量，一定超過了不少，因此它比具有同一技術水準的行會手工業，也大大超越了。資本主義並非從技術的再組出發，乃由勞動力的再組出發的。

工廠手工業到了一定的程度，才進到大工廠工業，才進到機械的生產。在工廠手工業時代中，資本主義還是在襁褓時期，新興的資產階級同封建地主，作猛烈的鬥爭；到了大機器時代，資產階級才得了天下，解決了誰戰勝誰的問題，開始了資本主義的勃興期（自由競爭時代）。然而資

本家爲着多得超額利潤，一定爭先恐後地促進了技術的改良。可是競爭要是不斷進行，貫澈着優勝劣敗的天演公理，又一定形成了生產的獨佔，使全國經濟，集中在少數金融資本的手裏。到了那新時代，資本主義已轉化爲「腐化」的資本主義，企業的競爭，不再留心於技術的改良，而是獨佔者制服非獨佔者的決死的鬥爭。因此，一切新技術和新發明，往往都被獨佔者所拒用，而表現停滯狀態。

總之，自從人類墮入不平等的陷阱以至今日，其中雖然經過好幾個時代，但每個時代，榨取階層所關心着的不是技術，而是勞動力。我們認定勞動力的所有者（勞工層）在生產力中所佔的地位，是高過一切，難道這還用得着懷疑嗎？

在論爭中，對於「技術卽生產力說」的批評，只有薛暮橋先生，曾有

過較充分的話。他說：

「自然，我們並不否認生產力中包含着技術底因素；可是，我們不能忽視，生產力有技術的一面，同時還有社會的一面。這就是說，人和人的社會關係，同時也是構成生產力底一個重要因素。例如生產手段底社會的使用，勞動力底社會的編制；這些自然的因素或技術因素，必須通過一定的社會關係，才能發揮着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假使『把生產力解做人類對自然的技術範疇』，那麼王、張兩先生最愛引用的一句名言——『就一切生產工具來說，生產力之最偉大的，就是革命階級本身』——就會無法解釋。」（五〇頁）

薛先生指出了技術不過是生產力的一面，但還有其他的一面——勞動力。可是在生產力中，勞動力和技術佔着怎樣的比重，這問題可惜中農各位戰士，始終沒有具體提到。我以爲這一對比問題，是了解生產力的鎖

論，也是批判中國經濟派的關鍵。忘記了這一點，也就不能盡情地攻破論敵的陣地，鞏固和加强自己的壁壘。

「中國經濟派」既以技術當作生產力，對於怎樣了解生產關係，怎樣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關係，自然弄得一榻糊塗，錯誤百出。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即是『人與人間的關係』和『人與自然間的關係』之間的矛盾。」（王宜昌語，轉引自中國農村社會論戰批判五頁）

「要知道問題並不在於隨時隨地記掛着一個『生產關係的框子』，而在於這框子怎樣發生、發展和變化，這就不能不留意到生產力所演的重大作用，即王宜昌先生所說『生產力衝破生產關係』這回事。……資本主義的特質是『生產先於消費，供給先於需要』的盲目生產，而這特質是被進步的生產工具所決定的。換

言之，即被某種技術方面的東西所決定的。……我們知道工場手工業之異於個人的小生產，正因手工場之內部分工提高了生產的技術水準。生產技術之提高不一定表現於工具之變爲機器，同樣的工具之不同的編配，也可獲得相等效果。」（張志澄語，論戰一二九至一三〇頁）

張志澄先生認爲生產關係是由技術所決定；「資本主義的特點」是「被某種技術」「所決定」；「工場手工業」與「個人的小生產」不同，是因爲「手工場內部分工提高了生產的技術水準」。因爲技術是決定生產關係，所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是「人與人間的關係」和「人與自然間的關係」的「矛盾」。

前面我對於王先生以技術爲生產力的見解，曾下過批評：第一，我說

生產力的要素，不單是技術，技術之外，還有勞動對象和勞動力，所以不能以某一要素，當作全體；第二，我指出在生產力中居决定的地位的是勞動力，而不是技術，因爲技術只具有生產的可能性，必須加上了人力，生產才有實際的意義。我在這裏已暗示讀者，各個生產的要素，在分立的狀態下，並非生產的現實要素，只是可能的因子，必須各個要素統一起來，才能構成實際的意義，才有實在的生產力。卡爾說：

「不論生產的社會形態是怎樣，勞動者和生產手段，總不失爲生產上的主要條件。但如果它們二者，只在分立的狀態下，充其量只可構成可能的生產條件。不然，要實行生產，必須把兩者統一起來，這種統一的特點與方法，是區別各個社會結構的標幟。」（資本論第二卷第一章）

雖然是幾句簡單的話，對於我們了解歷史的發展，是非常扼要，非常

精闢的。這段話是說，各種生產力的要素所結合的方法，生產的方法，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形式，生產關係，就是劃分歷史上各種社會結構的基準。換句話說，生產關係就是人類在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各種有歷史性的社會關係。要不然，撇開了生產關係這概念，也就不能認識各種社會的規律性，不能認識各個時代的物質生活了。

一班機械論的信徒，不從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的結合方法這一概念，來了解各種社會的特質。在他們的心目中，技術是高過一切，技術是生產力，技術決定生產關係。要是諸君也曾讀過這幾年蘇聯哲學界批評機械論的文獻，恐怕總不會忘記大名鼎鼎的布哈林。他就是機械論的老將。也就是他，首先規定了以技術爲生產關係的決定要素。請看他怎樣說：

「無論是工作形式或工作效率，無論是勞動關係或生產關係——這一切都受

技術所決定。」（唯物史觀二三三頁）

我們已經知道勞動力和生產手段所結合的方法，是各種社會結構的基準。但是有一點，還要解釋一下。勞動力和生產手段所結合的方法是怎樣，乃根據生產手段的分配是怎樣而來的。有怎樣的生產手段的分配形式，也就有怎樣的生產方法。生產手段的分配不同，生產方法也隨着不同。因此，必須通過生產手段的分配關係，生產力才能決定生產關係。要是忽視了（機械論者正忽視一點）生產手段分配的形式，以爲技術，以爲勞動組織，高過一切，決定一切，那是絕對錯誤的。試舉例來說。我曾說過工廠手工業的勞動組織（技術）和行會手工業是一樣的，但兩者代表着不同的經濟制度，代表着不同的社會範疇。工廠手工業是資本主義制，行會手工業卻是封建制。爲什麽具有同等的技術而社會性質是完全不同呢？

理由很簡單，因爲在工廠手工業裏，人與人的關係是資本對勞動的關係，一方面有喪失了生產手段的工人，另一方面又有集中一切生產手段的資本家。因爲這裏對於生產手段的分配與行會手工業（生產者握有勞動工具）不同，正是這一點，所以工廠手工業是驅使着赤條條什麽也沒有的工人，生產剩餘價值的機關。說技術規定生產關係，那麽，誰也不能解釋以下的兩件事：第一，不能解釋爲什麽在同等技術的基礎上，會發生新的資本主義關係；第二，不能分開工廠手工業和奴隸勞動組織的差別。

張志澄和王宜昌諸先生又把已經被判了死刑的機械論複寫了一次，並且拿它應用於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自然弄得謬誤百出。

同時，我已說過，必須各種生產力的要素結合以後，才有實在的生產力；但這結合是有歷史性的。這歷史的被制約性，是以生產關係作先決的

條件。因爲是這樣，因爲生產是以某種有歷史性的生產關係作它運動的形式，所以生產力是歷史的範疇。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有不同的速度。

總括一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交互作用着的，生產力是生產關係成立的基本條件，同時生產關係又是制約着生產力運動的形式，使它循着某種歷史法則而發展着。沒有生產力要素的結合，也沒有生產關係，離開了生產關係，也認不清生產力發展的特殊性。

丟開這立場，要在生產關係的範圍外來觀察生產力的運動，這是無意義的瞎說。生產力爲什麼在封建時代保持着停滯的狀態？在資本主義勃興期爲什麼能突飛猛進？沒落期又爲什麼停滯起來？這一切疑問，與機械觀是無緣的。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基本條件，這是歷史唯物論的ＡＢＣ。可是抱歉得很，王先生的機械觀剛剛忽視了這個ＡＢＣ，只從社會與自然的矛盾中，來看社會發展的動力。於是生產關係的相對積極性，生產力發展的特殊性等複雜問題，對於機械論就成為謎一般的奇談了。

三　什麽是農村經濟的研究對象

農村經濟研究的對象是什麽呢？關於這問題，中國農村和中國經濟的見解也是分立的。以王宜昌為首腦的中國經濟諸君，以為技術卽生產力，以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所以他們主張農村經濟的對象是技術，是生產力。在前面我已反覆說過，生產力的要素，只是死的個體，必須在生產過

程中，它們才有生命，才形成了實在的生產力。但在生產過程中，它們結成着一個生產形式——生產關係。各種社會都有各種不同的生產關係，它是歷史的範疇。爲要認識各種社會，認識各社會的生產，也必須先認識生產力運動的各種形式——生產關係，所以中農主張研究生產關係。

王宜昌先生說：

「我是對於技術的進步，即生產力的進步，看得很重的。我從我所理解的生產力底涵義中，窺見中國農村生產工具的資本主義的變革，和其相應的生產關係的轉移。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與其規模大小的分劃，使我不能再以土地問題爲農村經濟問題的中心，而以資本問題爲中心的。」（論戰一一〇頁）

錢俊瑞先生說：

「……王毓鋼先生都有以私經濟的研究爲主要工作的傾向。……我們可以說

作爲那些私經濟的活動內容的基礎的，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而是人對自然的技術關係。因此，舊有農業經濟研究的任務，就在詳細分析農場收支以及資本運用的情形，求得何種農業企業最爲有利。……王宜昌先生過分重視農業經營的收支，資金的運用，以及農業生產勞動等等技術的分析，結果也會陷入於私經濟的泥淖。」（八六至八七頁）

「總括起來，我們研究的對象是中國農村的生產關係，我們對於人與自然的技術關係以及私經濟的活動的分析，固不應放棄；但是，所有這些在我們的研究領域之中都是處於從屬的，補助的，初級的地位；我們對於它們的分析無非是要加深我們對於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的了解。」（八八頁）

然而什麼是農村生產關係的中心問題呢？錢先生說是土地問題。爲什麼？

「（一）土地是農業生產最主要的生產手段，但根據我們的估計，中國全部

的耕地，大約有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農手裏；而佔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農貧農和雇農，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

（二）中國目下農村資金的累積與剝奪，主要以『土地所有』這一財產關係爲根據；換句話說，農村資金運用的可能和方向，一般地還是附隸於地權上面。同時，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活動，是目前農村資金累積的主要槓桿，而這些活動，一般地也是以地權爲基礎。誰不承認地主和富農是目前中國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主動者呢？

（三）農村勞動力的荒廢起因於農民的失地，而完成於大土地所有者的不致力於大規模的經營（工業不發達的條件除外），因此，使這一種主要的『生產力』——即勞動力走上頹廢毀滅之途徑。」（七五頁）

錢先生接着再說：

「很顯然的，在上述意義之中的土地問題是主要的指土地的分配問題。關於

這個問題，我們至少闡明下列幾點：

（一）中國現存各種土地所有的形態和性質。……

（二）中國現存地權在各階層之間的分配……。

（三）……農業經營的研究……一定要注意下列幾個方面：

（A）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村市場的機構。……

（B）農業經營面積的消長和農業成本的構成。……

（C）……中國農村僱傭勞動的成份。……

（四）……租佃關係的問題。」（七五至八一頁）

這篇文——現階段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任務，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寫的，這是代表幾年來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最高水準。錢先生指出我們應從土地問題，租佃關係問題，僱傭勞動問題，農業經營問題，農業商品化和農村市場問題等等，來分析中國農村的生產關係，闡明農村社會的

性質。後來遲了一年，薛暮橋先生在中國農村所設的農村經濟常識講座，在理論大衆化的目標下，把錢先生提出來的綱領，更平易的更系統的發表了出來。

四 是資本主義還是半封建？

批評了「中國經濟派」的方法以後，還要再批評一下方法的實際應用，以作本文的總結束。

「中國經濟派」諸君這樣熱心來辯護機械論，無非是他們相信只有機械論才能夠辯護他們的經濟觀點；或者反過來說，因爲他們中了機械論的毒，才作了不正確的經濟分析。他們既以技術爲農村的研究對象，也當然從技術的分析，來看中國社會的性質。

「農業機械和人造肥料的應用，不惟表示資本制的農業生產力的進步，同時更表示資本制的國內市場在農村裏的擴大，資本在農業上的增大，和農業上的資本制的生產關係。」（引自批判三八至三九頁）

「在中國統計中，雖還少有爲我們記載出資本制農業經營的，但從前述僱傭勞動，農業機械，人造肥料等在中國農業經營上的使用，我們可以推知中國是有資本制農業存在的。」（四一頁）

這些話是王先生在一九三四年末至一九三五年初寫的。到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又在中國經濟（第三卷第十二期）寫了一篇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答客問。這篇文可說是王先生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總結。在這篇文裏，王先生又把他的機械觀複說一遍了。請看他的自白：

「我從帝國主義商品的推銷和原料的吸取上，從中國都市的民族資本主義金

融的支配，原料的吸取和商品的推銷上，從中國農村資本主義的形式上，來論證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實況和性質。……我決定地說中國農村是資本主義佔優勢，農業是資本主義佔優勢，我除了在商品生產和技術改革之外，又有工業從農業獨立，和都市對農村支配的關係在內。」

原來，王宜昌先生的方法是有兩種妙用。他「決定地」肯定中國農業經濟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而這種「性質」，是從兩方面看出來。第一是農村已採用了機械，農村已有了農業經營，有了大農場；第二是帝國主義和民族工業的對於農村的支配，促進了農業的交換關係。所以他「決定地」下結論：「我不以農村來規定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及其發展的前途。」

王先生的方法怎樣害了他患着錯覺症，在本文的末尾再加以批評，現

在先看王先生認爲可以「論證」的「技術」，是不是已佔了「優勢」？帝國主義怎樣支配農村？

「中國農業中還存在有封建的經營，但過渡性的經營已占很大數量，資本制經營也興起了。」

這話也是王先生親筆寫的，他既已「決定地」說資本主義已佔了「優勢」，但忽然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把自己的話，推翻得乾乾淨淨。我相信除非是文盲，決不會把「興起」，誤作「優勢」；我又相信，除非是弄把戲，也不會忽然說「過渡性的經營已佔很大數量」，忽然又說資本制的經營又佔「優勢」；這毋怪余霖先生要理直氣壯地說：

「不錯，『興起』是『興起』了，但『興起』不一定就佔優勢；何況佔『很大數量』的還是『過渡性的經營』；更何況中國農業中還存在有封建經營。」

難道王先生專來製造矛盾，令人不可捉摸嗎？我想也不盡然。王先生的話是別有妙用的，他原來以農村經濟的商品化，當作是資本主義化。他不是說過帝國主義對中國農業的支配，只是「商品的推銷和原料的吸收」嗎？只通過交換過程來控制農村，並不是佔有生產過程，來改造農業，那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功勞，豈不是只促進了商品經濟嗎？以商品經濟爲資本主義經濟，那麼，王先生和他的先輩任曙、嚴靈峰先生又同一鼻孔出氣。王景波先生也有同樣的妙論：

「中國身受國際資本的支配，那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在中國已經佔了優勢。」

可是王先生的戲法又來了。他完全不了解中外資本的發展不平衡代表兩種社會作用，結果他以爲外資「打倒」華資，不能說「阻礙」中國資本

主義的自由發展。請看他怎樣說：

「帝國主義的進攻民族的手工工廠和民族的資本制農業，而使其殖民地化，……在理論上並不是帝國主義阻礙『資本主義』，而只是說，帝國主義在競爭中打倒了民族資本主義。」

「在分析中國農村資本主義時，不應把帝國主義看成資本主義以外的東西，而應把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同樣看成資本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的性質定了以後，才能再分別出民族資本和帝國主義的競爭來。」

這是「任記」和「嚴記」的貨色，明眼人那個不一目了然！

總之，不論王宜昌先生怎樣辯護，他的農村經濟的結論，是辯護不來的。辯護不來的不是王先生不肯研究學問，王先生是一位好學的經濟學者，這是誰也知道的。辯護不來的乃是他的方法——機械論的方法。

敗了仗，被剝奪了侵略者的資格。後來賴着華府會議的一席話，才決定了中國爲英美日法四國的緩衝地帶。但在這地帶，你不肯放鬆我，我也不肯放鬆你，於是維持着一個相持不下的局面。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後，時局就完全改變了。從前是强盜們「成羣結隊的」跑進來，全國都佈滿了「侵略者的天羅地網」，如今却讓「東方的黑花臉」單獨出台，演着「獨覇東亞」的悲劇。這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機，震動了全中國，使全國各階層，各政黨，各武力，已改變或正在改變他們的關係，使民族戰線和漢奸戰線，已改編或正在改編他們的陣容。這是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

在這新的形勢下，經濟學者應該怎樣負担起他們的救亡工作呢？錢俊瑞先生在目前研究中國經濟的目標一文，指出：「一切研究中國經濟的夥伴們，應當在這總的任務下，規定他們自身應做的必須做的工作，這個工

作就是研究中華民族對敵抗戰的物質和社會的基礎。」—（中國農村第二卷第七期十五頁）後來在怎樣研究中國經濟那小冊裏（青年自學叢書第一輯中），又把「抗戰的物質和社會的基礎」一語，引伸爲下面三種方案：

「第一，帝國主義，特別某帝國主義，在如何掠奪我們的領土和資源，破壞我們的經濟壁壘，更進而摧毀我們整個的國民經濟。第二，在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之下，中國各個民族和各種社會成份，那些一定作爲抗敵救亡的主力軍，那些可能參加抗敵救亡的民族陣線，而那些又定然會參加敵人和漢奸的陣線。第三，我們要研究中國現有的資源和生產金融的裝置，使牠們怎樣配合着全民族的抗敵戰爭，進行必要的開發和動員，來保證對敵抗戰的勝利。」（一一六至一七頁）

雖然是很簡單的幾句話，很抽象的幾個原則，但可以說，這是國防任

務叫出來以後，經濟學者所標榜爲「今天的課題——國防經濟」的綱領草案。在這裏錢先生苦口婆心地指出國防經濟的任務，必須研究（1）敵人怎樣破壞我們的經濟壁壘；（2）中國社會內層已發生怎樣的變化；（3）怎樣動員抗敵救亡的物質條件。尤其關於第三點，錢先生曾力說過去輕視技術研究的大錯，說：「……我們一定要糾正過去對技術的範疇和社會的範疇機械地對立起來的錯誤，我們一定要從民族總動員的觀點，分析社會和技術的構成，而把社會關係和技術關係正確地聯系起來。」（中農一五頁）

錢先生說國防經濟要研究抗戰的物質和社會的基礎，又說國防經濟要統一着技術和社會的範疇。他在兩處都把技術的物質的要素，寫在前頭。於是使一向以技術爲經濟學的對象的王宜昌先生，非常自鳴得意地從新的

環境下，把舊事重提起來。他在中國經濟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三六年九月號）寫了一篇經濟學的題外諸問題，劈頭就反對科因、栗奇滄、錢俊瑞、孫冶方等以生產關係爲經濟學的對象。他以懷疑的眼光問道：

「有了許多學者意見的保證，然則經濟的對象便是生產關係了麼？」（五六頁）

他說了這問話後，立刻再下斷語：錢先生「也似乎對此對象懷疑」，（五六頁）錢先生「在注意人對人的關係底生產之外，又注意人對自然的生產力了」（五六至七頁）。

眞如王先生所指出一樣，錢先生「懷疑」過去的主張，改變過去的態度，認定以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嗎？我把錢王兩先生的文字，仔細讀了幾遍。我覺得錢先生並沒有對過去的主張，有什麼「懷

疑」，只覺得他是在新的形勢下，來重新估定經濟學者的任務，更具體的把握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了技術關係的研究在國防經濟學中的意義。這只是在新的形勢下，提出了新的任務，並非對過去的觀點，發生過懷疑或修正。相反的，我反覺得王宜昌先生「似乎」對他從來所抱的見解——那以技術爲經濟學對象的見解，表示着懷疑。不過我覺得很可惜，他一面提出了修正，一面又修正得十分不澈底，只以新的形式，來擁護舊的立場。關於王先生的自我修正，留下在第二節再加以檢討，現在先說錢先生關於國防經濟的認識。

爲什麼我說錢先生是在新的形勢下，來重新估定經濟學者的任務，具體的把握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技術關係的研究在國防經濟學的意義呢？

新的形勢是什麽？經濟學研究什麽？什麽是經濟學的新任務？爲什麽目前必須着重技術關係的研究？

「目前中國情勢的特點，是在某帝國主義想使中國從半殖民地，變成它的完全的殖民地，同時，中國民衆的救亡運動，正有空前的高漲，可能發展成全國一致的武裝抗戰。……我們研究目前的中國經濟，就應當根據我們全國人民的總的任務，規定今天我（們）要做的工作，這個工作，就是研究中華民族對敵抗戰的物質和社會的基礎，以便建立起我們國防經濟。」（怎樣研究中國經濟一一六頁）

據我個人的了解，錢先生這一段話，應該分三點來加以說明。（1）目前的新形勢，（2）新形勢對於階級關係的影響，（3）全國抗戰的物質基礎。這三點都有關聯，都有因果的關係。說到新形勢，三尺孩童都曉得，那是日本要「把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爲日本殖民地。」

這新形勢刺激着每個愛國愛民族的國民，向着他們「送來了亡國滅種的大禍」，「把一切不願當亡國奴充漢奸賣國賊的中國人」，「向着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開展神聖的民族戰爭。」

民族資本的買辦性和封建性，原來是十分濃厚的，他們不能澈底執行民族解放的任務；地主，富農是封建搾取的主動者，是農業革命的主要對象。在不久之前，他們結成了一條反進化的戰線。但到現在，敵人對於土地的佔領，對於資源和生產機關的掠奪，已使民族經濟壁壘，變成七零八落；全國的走私，打擊着民族工業的要害。他們對抗戰反漢奸的抗爭，已漸漸寄與同情或好意的中立。五年來的國難告訴我們，敵人在東北對於土地的掠奪，是不分主奴，一律同等看待的。也許我們要罵嚴靈峰、任曙諸位先生，對於中外資本，不分界限，是患了錯誤病，可是敵人對於土地的

掠奪却「一視同仁」，他們無須乎厚於此而薄於彼。所以地主縱使盡量把農民剝得精光，不幸而亡了國，土地也是保不住。小氣力薄的中層社會是最缺乏堅定性最容易消極悲觀，過去他們常常隨着上層社會而動搖不定。到了今日，他們也憂慮着家破人亡的慘痛，積極起來參加救亡運動了。因此民族革命戰線與民族反革命戰線，重新改變或正在改變它們的相互關係。

有了新的形勢，有了階級的新關係，經濟學者的任務，就決不應劃地自限，單單要闡明中國社會的性質，也不應單以技術的研究來作社會結構的旁證。他們不單要分析中國社會的結構，不單要根據技術的研究，再確認中國社會，以這結論來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和方向。那是非常可寶貴的工作。但他們目前的工作，不應單單只有這一點，不應單單只分析某些階級的經濟基礎是怎樣，對革命的態度是怎樣，更要緊是針對着新的

局勢，研究一向沒有民族自信力或缺乏民族自信力的人，怎樣改變態度，怎樣同情或參加救亡的鬥爭；研究怎樣動員他們，怎樣動員他們的一切抗敵的力量。換言之，是研究抗敵的社會基礎和抗戰的物質基礎，是研究抗敵的人力和物力。

過去我們並非絕對反對研究技術，只反對以技術的研究爲目的，並不反對以技術的研究爲手段。以它爲手段，就根據技術的分析，更具體的了解中國社會，以它爲目的，就一定以技術的改良爲研究的歸宿。在今日的中國，技術的改良是沒有可能的，要改良技術，必須先改變生產關係。所以生產關係的研究當爲主，技術的研究當爲末。但五年以來，因爲敵人的進攻，已經開展或正在開展着全國性的抗戰形勢，在那時候，技術的研究主要不單單爲要了解社會的結構，而爲着要準備戰時的物力。我們不應單

單以社會組織原理，來估量各階級對民族革命的態度，更應該分析目前的形勢，來預測他們對革命鬥爭的新要求。在國防的旗幟下，我們不反對生產的提高和改良，不反對分配的組織和管理，我們相信只有動員全國的物力，才能戰勝我們的敵人，爭取我們的自由。所以國防經濟規定技術在研究工作中應當估主要的地位，並不是改變經濟學的對象問題，以技術範疇為主。恰恰相反，它是以新的環境為前提，來了解技術關係。不是取消了生產關係，乃是以它為前提，來重估技術的價值。

二　舊事重提的技術觀

王宜昌先生的技術觀，在一九三四年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中，已被人揭破了假面具，現出了原形——布哈林機械論的再版。其實不考察

「人對人的關係」，而只看見「人對自然的關係」，又那裏可以認識中國是一個什麼社會！蘇聯經濟學者多呵爾與阿比士瓦斯說得好：

「不錯，機械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的特點，但反過來說，沒有機械的地方，也就沒有資本主義，那就大錯了。試拿富農說吧。任何人也知道富農的本性是資本主義的。可是富農中有許多是不會用機械生產的。所以要根據技術關係，以直接決定生產關係，決不能够分別各種社會結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必有一種技術水準爲前提，可是並非說，資本的特點，就是一定的技術水準。」（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四八頁）

所以要明白標榜着技術，來分析社會結構，再沒有人相信是正確了。

這迫着王宜昌先生要來一次修正——至少在字面上作一次修正。他寫着：

「經濟學底對象是人對自然的關係與人對人的關係底統一體，是生產力與生

產關係的統一體。這統一體便是所謂生產方法。」（中國經濟五七頁）

這裏王先生要說的是什麽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前他以這對象爲技術，現在忽然把它改爲「生產方法」。但生產方法是什麽？生產方法是不是生產關係？王先生一再警告我們，必須把它們「區別開」，如果把兩者「混淆」了，結果，「那會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生產方法不是生產關係是什麽東西呢？他認爲生產方法是「除了人與人的關係之外力說自然與人的關係」，是「人和的人的關係以外的人對自然的力說」。原來，他兜了幾圈子，又再兜囘頭，正如一個不倒翁，任你東推西撥，轉來轉去，結果到底總是端坐。這對象，他忽然說是「生產力」，忽然說是「人對自然的關係」，忽然又說是「生產方法」。所謂「生產力」，「人對自然的關係」，「技術」，「生產方法」，都是同一的東西，這說明王先生

的見解沒有絲毫的修正，至多也只是舊貨翻新。不過在這裏我們感覺得非常有趣的是，王先生爲什麼「區別開」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把生產方法和技術當作同義語？

王宜昌先生要「區別開」生產方法與生產關係，他的主要根據是資本論序言中的一句話：「我在這本書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和那些與它相對應的生產關係及交換關係」。蘇聯的拉布特夫讀了這句話，馬上就說：「卡爾到處把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區別開」，王宜昌先生也提醒我們：「我們必須把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區別開」。王先生聲明作結論的不是他，乃是資本論的作者。可是事實上分裂的責任是歸於王宜昌先生抑或歸於馬克斯？爲要辯正是非，請讀者細讀這一段話：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一開始就有兩個特點，與其他方法不同。第一個特點

就是生產物的商品化。然而這方法，與其他的生產方法不同，不在乎商品的生產，而在乎生產物的商品化，有普遍的決定的性質。這點首先表現於以工人爲商品的販賣者，以自由工錢勞動者，以工錢勞動制，爲先決的條件。……第二，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二種特徵，在於剩餘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是生產的決定因子。」（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冊四一五頁）

卡爾在這一段話中所擧出的兩種特點：（1）勞動力的商品化，和（2）剩餘價值的生產，正是作爲歷史範疇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標誌。他明明白白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但是卡爾並非在什麼時候，都把生產方法當作生產關係，他有時也把生產方法，當作技術基礎，「某產業部門的生產方法有了變革，接着其他部門也起着同樣的變革……」。（資本論第一卷三六四頁）

總而言之，卡爾所用「生產方法」一語，有種種的說法。但用「生產方法」來作「技術」時，他並非要下什麼定義。所以伊里奇說：「他並非來下定義」。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的作者也同意這主張，說：「定義對於卡爾是毫無用處」。可惜許多經濟學者，只會斷章取義，對於經濟學的對象，就發生了種種的誤解，把經濟學和技術學混淆起來。在這一類的經濟學者中，蘇聯拉布特夫是一個代表。

「卡爾沒有把資本主義的生產，還元於『物質的技術的生產』，同時也沒有把它還元於某種生產關係。他把那生產方法，當作使用價值的生產（人控制自然的生產）當作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生產，當作資本主義關係的生產和再生產的統一，而加以考察。」（引自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八六頁）

拉布特夫相信資本論所研究的，不單是「人對人的關係」，而且研究

「人對自然的關係」。王宜昌先生的意見，不是與拉布特夫，一模一樣，沒有半點不同嗎？然而不幸得很，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爲後一種關係是技術學的對象，不是經濟學的對象。卡爾所了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三卷資本論，就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第一卷分析生產過程，第二卷分析流通過程，第三卷分析資本主義的總生產過程。他偏要提出生產方法，並指出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與它相對應，是因爲他把它們兩者，當作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要素，當作某一經濟結構的要素來看。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一語，是指某種生產經濟形態而言，也卽是指某種生產關係而言。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不是人對自然的關係，乃是人對人的關係。

王宜昌先生不了解這一點，他從哲學的貧困裏引了一句話：「生產方

法，即獲得生活資料的方法」，又在資本論引了一句：「怎樣進行生產，用什麼勞動工具」，就馬上下結論，說經濟學所研究的是生產方法——技術。可是這是技術學的對象，並非經濟學的對象。

然而是不是說技術完全與經濟學無關？那又不盡然。我們已知道技術可作闡明經濟結構的次要條件，這是因爲某個時代都有某時代的技術水準的緣故。雖然技術水準不能決定社會的結構，要是以它當作一種次要條件，來確認生產關係，那也是很必要的。

譬如說，有人認定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要否認此說，就必須分析生產關係。我們分析了中國社會的各種生產關係，決定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決定中國社會性質的決定條件，就是生產關係。但是這社會經濟形態，在技術上也可以反映出來。農業在全

國經濟生活中佔一個決定的地位，但農業生產，除了極少數的大農場以外，一切農業經營，所用的生產工具，都是幾千年前的犂、鋤、鐮、耙，這樣的技術水準，無論如何也不能反映資本主義。

國防經濟把技術放在第一位，並非以技術爲研究對象，對技術的重視，是在新的社會關係下來估計技術的意義。錢俊瑞先生說：

「……我們研究中國經濟的夥伴們在過去曾集中他們的力量在中國社會的分析上面，這本來並沒有錯。然而我們在目前，却要提出我們的新任務，我們必須用更多的注意，來研究中國資源的分配，生產以及金融交通運輸的技術機構，爲的是要完成我們經濟上的總動員，保證我們對敵人抗戰的勝利。」（中農第二卷第七期一五頁）

錢先生這一段話，與我的分析，並沒有出入。不久以前，我們很努力

分析中國社會的性質，同時也注意技術的研究，這無非是要具體的了解社會結構的矛盾。我們指出目前生產關係，怎樣阻滯着生產力，指出技術的改良，沒有社會的基礎。這裏誰也不會誤解，經濟學的對象，是以技術爲主，以生產關係爲末。但在救亡鬥爭瀰漫全國的現在，所有從前失了民族自信心，敵視中國革命的人，現在對革命已守着中立或表示同情了。一切從前缺乏民族自信心，瑟縮不前的人，現在已漸漸堅定起來，相信我們有遠大的將來了。爲着發動一切可能的革命力量，共赴國難，技術條件，不只具有消極的作用，並且具有積極的作用。可是技術並不是對「人與自然的關係」而總動員，乃是集中全國的一切物力，來制服敵人。它不是天上，而是地下的。在運用上，雖然技術已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技術的新任務，乃由階級的新任務所決定，階級的新任務，又由社會關係所決定。轉

過來說，不了解中國社會的結構，對於階級關係的演變，一定不十分明確了解，不了解階級的演變，也不了解技術的意義。總之，歸根到柢，國防經濟的對象，也是以生產關係爲主，技術關係爲末。